



2009 年 6 月 23 日第 16 期

总第二十六期

2008 年 9 月 13 日创刊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革研究

本期目录

书评与序跋

[余汝信](#) 关于林彪 1967 年 6 月 16 日的信及其他——致阎长贵先生

[钱家骥](#) 难得之信史——致阎长贵并王广宇先生

史林一页

[路 阳](#) “二月逆流”问题中有待研究的一次会议

[王 锐](#) 文革小报拾异

[杜钧福](#) 批判相对论轶事

口述历史

[从“现行反革命”到“英雄战士”](#)——康育义教授访谈（节录）

文摘

[史 学](#) 探寻“三国四方”会议真相

小资料

[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名单

编读往来

[阎长贵](#)答李自茂

【书评与序跋】

关于林彪 1967 年 6 月 16 日的信及其他
——致阎长贵先生

余汝信

长贵老师：

惠寄的《问史求信集》昨已收到，谨致谢意！近年来，在平面媒体或电子媒体上陆续读到您及王广宇先生有关文革的不少佳作（尤其是关于在中央文革小组亲身经历的回忆文章）。这些文章，对于文革历史的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颇有价值。如今能在大陆结集出版，省却了研究者们多处寻觅、复印的功夫，确为了一件十分庆幸的事（记得今年一月您告诉我，该书红旗出版社准备出版，我还不敢相信）。

书内所附“印刷中的若干技术问题”，勘正了校对过程中因匆忙而未能改正的一些错处，很好。至于非“技术性”的问题，大致读了一遍后认为还有一些。以下数处，提出以供参考。

一、关于林彪 1967 年 6 月 16 日一封信的处理经过

您在《林彪不让祝他“永远健康”内情》（288-290 页）一文中，引述了林办秘书张云生在《毛家湾纪实》中的回忆。《毛家湾纪实》的原文为：“1967 年夏，林彪又去住大会堂。一天，他让内勤来叫秘书。张益民去了。林彪口述了一封给总理和中央文革的信，中心意思是在各种宣传形式中，要‘突出主席’，而不要突出他、宣传他。其中，提出了六条具体要求，规定不准为他歌功颂德、树碑立传，不准出版以宣传他为主题的小说、戏剧、电影和文章，不要喊祝他‘永远健康’的口号。他并要求把这封信印发给全党、全军和所有群众组织。据说这封信送到总理手里以后，总理表示此举可以不必。但林彪想‘突出主席’之心十分迫切，就绕开中央办事机关，而派林办工作人员径自把此信送到军内的一个印刷厂，印了几千份，以便随时分发。碰巧，那几天大会堂接连举行一些群众集会，林彪只要听说这种会正在召开，就派警卫人员拿着几十份印好的林彪信件到会场内散发。这样，就收到了一举两得的效果，既表示了‘突出主席’，又宣传了自己的‘谦虚’”。（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

北京：春秋出版社 1988 年 7 月第一版 235 页）

殊不知张云生的“回忆”是会变化的。十五年后，他的“回忆”变成为：“1968年七八月间，林彪还有一些叫人感到奇怪的举动。一天，林彪叫秘书去，口述了一封给总理和中央文革的信。中心意思是：在各种宣传形式中，要‘突出主席’，而不要突出他、宣传他。他提出了六条具体要求，规定不准为他歌功颂德、树碑立传，不准出版以宣传他为主题的小说、电影、戏剧，不要喊祝他‘永远健康’的口号等等。口述之后，林彪派我去中央办公厅所属的印刷厂，火速赶印数千份，然后把它交给李文普。林彪对李文普说：‘大会堂这里经常举行各种各样的群众集会。以后你注意，只要见到有这种集会，你就把我的这封信分发给他们，叫他们必须照办。’李文普照着林彪的交代去送了几次，但时间不久，李文普觉得实在没有这必要，只要林彪不追问，他就再也不去送了。林彪在他的‘六条’刚刚印出时，曾叫李文普拿去面见总理，要求总理协助把他的信转发给全党、全军和所有的群众组织。李文普回来向林彪报告说，总理认为这样做大可不必。林彪听后也没再坚持，那些已经印好的‘六条’也就永久地压在档案柜里”。（张云生、张丛堃《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7月第一版441-442页）

张云生前后“回忆”都不对。林彪这封信全文不足三百三十字，根本没有什么“六条具体要求”；而且更重要的是，林彪这封信当月就以中共中央文件转发至全国、全军县、团级单位，根本无需因周恩来“认为这样做大可不必”而“诚惶诚恐”地自己找地方印刷，找人私下派发。

这就是标题为“林彪同志给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封信”的编号为中发[67]202号的中共中央文件。林彪的信全文如下：

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同志及中央文革小组全体同志：

近一个多月来，我看了三次演出，每次演出中，都有“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和“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这两个口号并提的情况。我认为“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个口号是完全正确的，非常必要的。为了在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突出毛主席的伟大作用，树立毛主席的绝对威信，不宜提“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口

号。只有突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才符合于全国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需要和客观实际。今后一切演出、一切会议、一切文件、一切报刊以及其他各种宣传形式都应突出毛主席，不要把我和毛主席并提。盼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们今后帮助注意掌握这一点，并希望将我这封信转发到县团级，由他们传达到所有的基层组织和革命群众组织。

此致

敬礼！

林 彪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六日夜

（发至县、团级）

该文件最后注明：“已发：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军事管制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分区党委，各部委。共印四〇,〇四六份。”“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十日发出”。

我十分赞同您在本书代前言中的呼吁——当代人应当修一部当代信史。惟真正要修一部信史，殊为不易！当前文革史研究中最大的障碍，在于虽然文革发动至今已过去了四十三年，文革中的档案、文件虽然早已过了国家法律所规定的保密期，但仍然不能开放。如果我们只凭个人的回忆，没有原始档案、文件的支持，是难以达致“信史”的目标的。张云生的回忆即为一例，他虽然当时就在林彪身边工作，但如用原始文件一对照，他的“回忆”（实为再创作）就显得缺乏可信度了。

二、关于“五一六通知”

您在《点燃“文化大革命”的三把火》一文中提及，“而这次会议所做的最大的事，恐怕就是它在5月16日通过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这成为‘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

标志”。（29 页）

以上所述多少有误。1966 年 5 月 1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是中共中央《通知》（非常简单明瞭，只有《通知》两字）。5 月 19 日，《通知》以编号中发[66]267 号中共中央文件“发到县委、文化机关党委和军队团级党委”。该《通知》作为当日的“机密”件，至今仍未全文公开，只是其首页的复印件，现可见于公开出版的、中央档案馆编纂的《共和国五十年珍贵档案》下册（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 1999 年 10 月第一版）955 页。

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是中共中央《通知》于 1967 年 5 月公开发表时所用的标题。除标题外，《通知》在公开发表时内文也作了多处改动（如原文中多处的“彭真同志”全部删去了“同志”二字，毛泽东修改或增加的文字全部变为黑体字）。故而，1966 年 5 月的中共中央《通知》与 1967 年 5 月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是有所不同的，一个是内部原件，一个是经修改的公开发表件，两者应不可混为一谈。

三、关于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

您在《点燃“文化大革命”的三把火》一文中提及，“一把火就是批发聂元梓等 7 人 5 月 25 日贴出的《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是康生通过他的老婆曹轶欧秘密策划的，目的是‘在北大点火，往上搞’”。（30 页）“康生大概觉得事情不妙，需要‘最高’发话，急忙将这张大字报的底稿（有的说是抄件），背着在京主持工作的常委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送给在外地的毛泽东”。（30 页）

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标题应是《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1966 年 5、6 月间，那时还是叫“文化革命”，尚未称“文化大革命”，就如当时重新设立的，叫“文化革命小组”，不叫“文化大革命小组”（而且当时提到文化大革命也不加引号）。问题是说“这张大字报是康生通过他的老婆曹轶欧秘密策划的”，窃以为并无事实依据。如果说聂元梓等人写大字报获得曹的首肯，那应该是事实，曹只是同意他们写大字报，并非主动“秘密策划”这张大字报。

聂元梓的回忆录有关这一段，窃以为还是接近事情真相的。聂称：

“我们要写大字报，因为是党员，又是给自己的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写大字报，从组织观念上说，我们就想到要请示有关领导。该请示谁呢？请示北大党委，陆平就是党委书记，我们绝对不能去找他，找他，他也不会同意。请示北京市委，彭真已经倒台了，肯定不能请示，该请示谁，我们也不清楚。杨克明说，那就找一下张恩慈，通过他问问曹轶欧吧。你给张恩慈打个电话不就可以了么？”（聂元梓《聂元梓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2005 年 1 月第一版 116 页）

聂给张恩慈打电话后，曹轶欧同意在他们到北大搞调查研究所住的西颐宾馆见聂和杨克明。“曹轶欧问我们找她有什么事情，我们就汇报说，听了‘五一六通知’，领会其精神，我们想给陆平写一张大字报，贴在北大校园里面。这样做，不知道行不行，想请示一下领导。曹轶欧说，根据‘五一六通知’精神，贴一张大字报，怎么不行呢？她并没有问大字报的内容，因为她在北大蹲点已经有些日子，北大的情况，她已经掌握了。调查小组里的张恩慈，本来就是北大哲学系的人，自然会向她提供基本情况”。（《聂元梓回忆录》116 页）

说康生“大概觉得事情不妙”，背着刘、周、邓将大字报的底稿（或抄件）送给在外地的毛，恐怕也非事实。正如您在该文中所说，毛是看到了刊有这张大字报的《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总编室 1966 年 5 月 27 日印发的《文化革命简报》第 13 期，知道有这张大字报，并为此在这期简报上写下“康生、陈伯达同志：此文可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此一批示的。

您在本书代前言中称，“康生是研究‘文革’史以至整个党史绕不开的人物”，很对。的确，康生是值得再研究的，这也包括再研究他在文革初期比如聂等大字报中的真实表现、实际作用，包括根据目前或将来我们所能掌握的真正可靠的史料，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要脸谱化，也不要说过头话。

四、关于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大字报

您在《点燃“文化大革命”的三把火》中提及，“再一把火就是‘热烈支持’

清华附中的红卫兵。……他们以‘造反’为旗号，于6月24日、7月4日、7月27日连写三篇‘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他们的活动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感到有压力。7月28日，在海淀区的一次文化革命工作大会上，他们将《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给毛主席的信，托到会的江青转交毛泽东。毛泽东8月1日就给他们写了一封意义严重而又热情洋溢的信”。（31页）

三张大字报的原标题应分别是：《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和《三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这三张大字报后来刊载于1966年8月2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一期时，标题均在“革命的造反精神”前加上了“无产阶级的”前缀词，改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据大字报作者之一的骆小海回忆，“7月28日，我和邝桃生等参加了在北京原苏联展览馆的电影院举行的海淀区中学生大会，发现江青在场，幸亏邝桃生笔记本上还抄有《一论》和《二论》的论造反的大字报（但缺《三论》），于是便撕下递给江青，还匆匆写了一张给毛泽东的条子。大意是请毛看一看是不是反动的。没想到毛泽东真地看到了，而且于7月31日起草（或口授）了回信，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文件在党内高层发表”。（骆小海《〈红卫兵兴衰录〉序》，载宋柏林著、余汝信编注《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香港：德赛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6月第一版22页）

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于8月1日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予与会者。该信日期虽署为8月1日，但因毛早于7月31日已将该信及附件（《一论》、《二论》）交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及文革小组各人阅看，故该信写作时间实应为7月31日或更前。惟原信当时及以后都未交至清华附中红卫兵手中。

五、关于“林副主席”

您在《1966-1967年江青、林彪和叶群的关系》一文中提及，“在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被毛泽东树为接班人，成为中共中央的唯一副主席”。

（291 页）这也是大陆史学界的习惯说法，然而，却与事实有很大出入。

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根据 1966 年 8 月 14 日中共中央《通知》的提法，“补选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选举了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补选了书记处书记”。选举（实为改组）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十一人名单排列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全会并没有重新选举中央副主席，因为常委名单排列的极大变化，原来的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朱德、陈云都排在并非副主席的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之后（陈云甚至排在李富春之后），只能不再提及全部原来的副主席（包括林彪）一职。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直至 1967 年中，在公开媒体提及林彪时，中央宣传口径用的都是“林彪同志”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提法，查阅一下当时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莫不如此。

公开媒体使用“林副主席”的提法，大致是在 1967 年中期以后。但窃以为“林副主席”此一提法，并不能理解为唯一指向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理论上如果“中共中央副主席”（包括林彪、周恩来）都不提的话，林彪还有一个职衔“中央军委副主席”是可以简称为“林副主席”的。这种情况，待 1969 年 4 月中共“九大”林彪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时才发生变化，其时，林彪才名正言顺“成为中共中央的唯一副主席”。

以上意见，匆匆而就，很不成熟，仅供参考。

顺候

撰安！

余汝信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日

【书评与序跋】

难得之信史

——致阎长贵并王广宇先生

钱家骥

长贵先生并王广宇先生 大鉴：

承蒙惠赐大作，《问史求信集》已悉心拜读，获益良多。洋洋四十余万言，字字胜似珠玑，句句掷地有声，实为近年来难得之“信史”。

先生们所言极是：当代史由当代人写，且必须写“信史”。余自幼好国学，尤以历史为甚，尝收集史料书籍，深感写史无信问题比比皆是，远的如根据二月河所著拍摄的电视剧《雍正王朝》，写雍正斩了大臣张廷璐，事实上张廷璐直至乾隆朝还陪同乾隆南巡，二月河显然篡改了历史。目前出版诸多“文革回忆”一类书籍，受制于诸多原因，不能写深、写细，对许多历史真相，模棱两可，不甚了了。如汪东兴著《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以汪昔日之地位，了解史料之详实，决不至于出区区十二万字的小书。另一类如叶永烈者，本为科普作家，涉足人物传记，写《江青传》等等，也只是到处拼凑材料。毕竟不是自己亲身经历，带有“推测和演绎性”，看后不过瘾。而且读者会怀疑其资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余读书有限，未曾大量比较，就目力所及，惟《问史求信集》是作者用血换来的事实写成。在有观点、有事实的回忆录中，此书是佼佼者。对文革中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此书基本都有表述，可谓“信史”楷模。

余以为，文革史应该是中国近代史中最重要的部分，亲历文革的上层人物或是接近、了解上层人物的人物已纷纷作古，抢救“文革记忆”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先生们正在排除万难，进行着艰苦卓绝的工作，要让老人们敢讲话、讲真话。比如，能否让林立衡写出林彪出逃前，她与周恩来最后通话的内容？能否搞清林彪的256号专机起飞，究竟需要三人同时签名，还是三人中的一人签字即可放飞？否则，这些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将被年青人淡忘，这是极其可怕的！

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余完全赞同两位先生的观点。文革之初，余尚是大四学生，作为亲历这一历史浩劫的青年，对文革中所有重大事件都历历在目。余以为：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的大倒退，没有任何正面意义，它造成的灾难，远大于纣王暴政，远大于秦王焚书坑儒，远大于中国历史上任何暴政！千秋易过，文革罪恶难消。百年之内，极左流毒不尽。文化大革命在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方面给中华民族造成的恶劣影响，将长久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而这一切，毛泽东是始作俑者（毛自己说过：“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

先生们力求正确评价历史和人物，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虽然有些问题目前还没有搞清的条件，但先生们全面评价历史的要求，已是呼之欲出了。这可以从书中第 419 页部分文字可以看出：

.....还有一些值得进一步考虑以及需要商榷的地方。比如：

- 1 . 怎样认识《五七指示》？它仅仅是“破旧”吗？
- 2 . 怎样看待《五七一工程》纪要？
- 3 . 怎样看待“九一三事件”？能否断言林彪就是叛国出逃？
- 4 . 怎样看待九届二中全会？能够说林彪、陈伯达的思想和行动是分裂党吗？
- 5 . 怎样看待 1974 年 1 月以中共中央名义召开的两次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能够说“江青私自召集”吗？

如此等等。

本书“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这一点在对华国锋的评价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多年来扣在他身上的“洋跃进”，“不懂经济”等罪名，在先生们的笔下得到了洗雪。他在粉碎“四人帮”行动中的地位也得到了重新估价。

华国锋曾经给他的同乡写过一些题词，真实地反映了他的思想。以余观之，他对不公待遇，心里是有看法的，现将影印件两份送给长贵先生，作为参考。(阎长贵注：两份影印件一为华国锋一九九二年元月十九日给郭海娥的题词：“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是老实人，因为只有老实人才能经得起事实和历史的考验。”一是同日给郭海莲的题词：“疾风知劲草，青松不知寒”。)

世事无常，所谓“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真实不虚。先生们以国学、哲学、历史的深厚功底，文章犀利，有幸被领袖选中，继而介入上层，处数十人之下而亿万人之上，荣耀无比，此为福也。然而伴君如伴虎，诚如书中所言：“路已经铺好了，你就只管拉车就是了。这些拉车的牛马，只能在驭手的驱赶下拉车，他们别无选择。”先生们由于驭手的权谋，又身陷囹圄，此为祸也。因身陷囹圄，得以全面思考诸多重大问题，探其原由，大彻大悟，继而对这段中国历史上最重

要的事件留下真实记录，成为文革史专家，此又为福也。且非先生一人之福，而是全社会，乃至子孙后代之福也。

斗胆指出书中个别笔误：

第 7 页第 10 行：1997 年 1 月中旬，应为 1967 年；

第 131 页第 7 行：他的是包掉到地上，应为他的皮包掉到地上；

第 161 页第 11 行：1957 年，应为 1967 年；

第 165 页第 18 行：1976 年 8 月下旬，应为 1967 年 8 月下旬；

第 245 页第 9 行：候补中央委员，中南局书记王任重。在我印象中，文革前王已是中共中央委员。(阎长贵注：王任重，1958 年 5 月八大二次会议增补为候补中央委员，文革前不是中央委员)

第 369 页第 23 行：每桶，应为每筒，和上文一致；

第 432 页第 3 行：竟然把这封信中公布出来，应为竟然把这封信公布出来。

另外，本书封面设计欠佳，扉页和书脊都印有《问史求信集》，而封面上只见“问史”，凸印的“求信集”只依稀可见，再版时可否改进？

由于本书真实、可靠，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建议和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联系，他们有一档节目，由陈晓楠主持《凤凰大视野》，专门邀请历史重大事件的亲历者作客，收视率非常高，影响也很大。

与先生比邻而居，如蒙赐教，三生有幸。特回赠余之先母诗词遗稿两册，旧体诗，风花雪月，无甚价值，聊胜于无。

专此即覆，顺颂

近祺

钱家骥谨启

二零零九年六月一日

【史林一叶】

“二月逆流”问题中有待研究的一次会议

路 阳

学界有关“二月逆流”的研究多集中于 2 月 16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碰

头会。而对于此前几天的一次碰头会，目前所知似乎不多，同时也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对于这次会议的时间和内容等问题，还有待研究者能提供更多和更准确的细节信息。

关于这次会议的内容，比较受到关注的是，叶剑英就建立“上海人民公社”的问题对陈伯达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叶剑英在会上表示：“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他同时向陈伯达指出：“我们不读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一八九七——一九八六》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959-960 页。《叶剑英传》编写组《叶剑英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6 年版。《叶剑英传》与《叶剑英年谱》两书关于叶的讲话内容，除了“不看书”变为“不读书”外，完全一致。）

关于这次会议召开的具体日期，也是一个尚无定论的问题。据笔者考察，目前存在三种不同的说法：（1）2 月 11 日。《聂荣臻回忆录》中提出日期是 2 月 11 日。（参见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下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854-855 页）《叶剑英年谱》、《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王年一、金春明著的文革史著作也持此说。（2）2 月 13 日。具体见纪希晨《一场捍卫党的原则的伟大斗争——揭穿林彪、“四人帮”一伙制造“二月逆流”重大政治事件的真相》，（《人民日报》，1979 年 2 月 26 日第 2 版）及宋琼、孙浩则、邵一海《所谓“二月逆流”的历史真相》（《解放军报》1979 年 2 月 26 日）。（3）2 月 14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提到叶讲话的时间为 2 月 14 日下午，并强调来源是根据经过核对的回忆材料。（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95 页）。另外，陈志凌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李富春》中也提到，这次会议是 2 月 14 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见陈志凌《“文化大革命”中的

李富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49辑，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第102-113页。）

笔者倾向于2月14日说，但仍需要进一步的材料证明。粗浅的理由有二：（1）2月12日，毛泽东召张春桥、姚文元来京解决“上海人民公社”的问题。在这次会上，毛泽东明确地表明了对这一问题的立场。笔者推测，叶剑英的讲话应在毛这次讲话之后。（2）笔者近日阅读新出版的《谷牧回忆录》，书中也间接证实2月14日这一说法。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是这次会议的参加者和当事人。谷牧在其回忆录中引用其日记的内容写道：“二月十四日……下午出席总理主持的碰头会。今天的会议好紧张。叶帅离席而又很风趣地说：‘我们这些人读书、不看报，搞不清什么叫个巴黎公社精神，是否请伯达同志给我们讲讲？’”（见谷牧《谷牧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30页）。如果此说确为谷牧当时日记所记载，那么2月14日说应可信。

然而，王力的回忆又使2月14日说受到怀疑。据王力回忆，2月14日下午三时到七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钓鱼台十六楼开会批评江青和陈伯达。（见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976-977页）。这两次会议绝不可能在同一下午进行，必有一说为误。

关于这次会议的具体内容、召开时间以及其与2月16日会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希望能有研究者做进一步的考察和说明，使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能得到清晰、准确的表述，不再众说纷纭。

【史林一叶】

文革小报拾异

王 锐

一份特殊的“复刊号”：《湘江评论》第二期

在笔者收藏的小报中，有一份比较特殊的“复刊号”。

这就是以清华附中红卫兵为首的“老红卫兵”所创办的《湘江评论》报第二

期。说其特殊，理由有三：

一是这份《湘江评论》由清华附中红卫兵、北大附中红旗、人大附中红卫兵、北航附中红卫兵、北师大女附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等五个中学红卫兵组织联合主办。众所周知，清华附中红卫兵，是震动世界的“红卫兵运动”的创始者，“红卫兵”组织及“红卫兵”这个名称的发明权，也属于他们所有。而北大附中红旗及人大附中红卫兵等几个中学红卫兵组织，则是当时“红卫兵”受到当局打压处于“非法状态”时，对清华附中红卫兵最坚定的支持者和狂热的跟风实践者。因之，这几个红卫兵组织，一直被视为“红卫兵”的创始人，以及所谓“老红卫兵”的核心。

二是这份《湘江评论》第二期，出刊于 1967 年 5 月 29 日，而这一年前的 1966 年 5 月 29 日，正是卜大华、王铭等几个人首创“红卫兵”的日子。这一天一直被视为“红卫兵运动”的“誕生日”。这期由正宗“老红卫兵”们办的《湘江评论》“复刊号”，选择在这个特殊日子“复刊”，显然有深意，还特别用了一版和二版整整两个版刊载了一篇题为《历史的教训——为红卫兵诞生一周年而作》的“本报编辑部”文章，试图对一年来的“红卫兵”作历史性回顾和总结。

三是这期《湘江评论》的“复刊号”，期数编号仅为第二期。也就是说，这份《湘江评论》“创刊”后仅出了一期，便遭遇停刊。其“创刊号”，就成了“停刊号”。这在文革小报中，也比较少见。这份时隔近一年才复刊的“复刊号”，为之提供了“佐证”（《湘江评论》创刊于何时，笔者手中尚无材料，查杜永平、周连成两先生所编《文革小报目录》，其所收录者，也只有这份第二期。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份《湘江评论》创刊于 1966 年红卫兵运动方兴未艾之时）。

《湘江评论》本是毛泽东早年在湖南主办的一份刊物，清华附中红卫兵等 5 个“老红卫兵”组织将其接过来，作为自己联办的小报报名，除表明对毛泽东的景仰崇拜，追随紧跟外，大概还带有要学当年毛泽东等“新民学会”有志青年，欲“指点江山”，“浪遏飞舟”的雄心和气概。

再从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期《湘江评论》“复刊号”的内容也颇多价值。

刊于第 4 版的《致读者》，其实是一篇“复刊词”或“复刊宣言”。全文如下：

致 读 者

我们《湘江评论》又问世了。

我们是在极艰难的条件中办这份报的。没纸，几经奋斗得到一小点。没印刷，跋涉山水方找到。但我们决心办下去。

既办报，就要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因为要折断他的肋骨。憎资产阶级，爱无产阶级，灭前者志气，长后者威风，仍是我们不变之宗旨。

每一个红卫兵，应当支持它、帮助它，有权利、有义务、有责任使这份报办下去。我们热情地等待着大家。

同志们，伸出你热情的手，共同奋斗吧！

《湘江评论》编辑部

联络地址：北大附中（28•1721）17

从这份“复刊词”，人们不难领会到这批当初风光一时，尽领风骚的“老红卫兵”们，如今风光不再，处境十分不妙了。连办报的两大最基本条件，纸与印刷，也不易解决，可见其生存之艰。显然，这批在文革大潮中一度呼风唤雨的“老红卫兵”们，已被逐出了红卫兵运动的主流，被边缘化了。不过，面对波涛汹涌的文革时代大潮，他们又不甘心，也正因此，才有这份《湘江评论》的复刊。

熟悉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批所谓“老红卫兵”，是因为“联动”问题，以及“炮打中央文革”而遭到打压的。在当时，不管是权势人物，还是普通公众心目中，似乎“老红卫兵”就是“联动”，“联动”也就等于“老红卫兵”。大概为了洗刷这种“罪名”，这期《湘江评论》复刊号，也不得不打起反“联动”的旗号。除了在那篇“编辑部”长文中对“联动”予以批判讨伐，称“联动”为“反动组织”，并承认“‘联动’及其反动思潮，实质上是‘老’红卫兵，尤其是干部子弟中一些人的活动及思想的代名词”外，还在二版专门开辟了一个题为《联动消息》的栏目，对当时仍不甘心失败的一些“联动”成员的种种活动予以揭露。这是很有意思的。

此外，也是在第二版上，引人注目地刊有一份《关于申请加入中学红代会声明》，落款者正是以“清华附中红卫兵”为首的这5个“老红卫兵”组织。《声明》一方面称“我们的红卫兵组织是最早造反的革命组织之一”，同时又承认“我们有人曾经犯过严重的错误”，但“毛主席让我们重整旗鼓”。因此，“我们庄严声明：清华附中红卫兵、北大附中红旗、人大附中红卫兵、北航附中红卫兵、北师大女附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坚决申请加入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这是我们神圣的不容剥夺的权利！”

可见，到这份《湘江评论》复刊为止，这几个“老红卫兵”组织，仍然被排斥在北京市中学红代会之外，不用说“主流”，连合法性也成了问题，可谓处境糟糕透顶。这也为研究“老红卫兵”及“联动”问题，提供了一份难得的材料。

这份《湘江评论》复刊后，到底结局如何，以后又出了几期，笔者手中尚无材料，不敢妄论。不过，从当时文革大势及走向看，估计后来的情况不会太好。

刊有《群丑图》的《东方红》“终刊号”

这是一份有双重意义和价值的小报精品。

其所以被海内外藏家看好，市场价格在2004年就突破了千元大关，正是在于这种价值的双重性。其一，此《东方红》第21期于第3版用整版篇幅刊载了著名文革漫画《群丑图》。此政治漫画因受到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严厉批评而身价大涨；其二，这第21期是“首都二司革命造反联络站”机关报《东方红》的终刊号。由于具有这双重的价值，此报成为“文革小报之王”，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文革中，以“东方红”命名小报者，全国各地多如牛毛，仅北京地区，就多达20余种。因此，在刊载这份《群丑图》之前，这份《东方红》，无论在京城，还是在外省，并不特别引人瞩目。其影响力，可以说尚不及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主办的《东方红报》。

此报原为“首都二司”所办，“二司”的全称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成立于1966年9月5日，是首都高校跨院校的第二个全市性红卫兵组织。此前，北京已有一个全市性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即“首都一司”）。因“二司”下属的一些组织对总部不满，采取造反行动，拉出队伍，另行成立了这个“首

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革命造反派联络站”又称“首都二司造反联络站”。这个《东方红》报创刊于1966年10月1日。在第6期之前，主办者为“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6期开始因“二司”总部被内部造反夺权，主办者改为在“总部”之后加上“革命造反联络站”字样，从第12期开始，又将其中“总部”二字去掉，之后一直到21期终刊，署名都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联络站”主办。但夺权之后，仍延续创刊时的期号、报头及版式风格。此外，笔者未再见到“二司”有另外的小报。

1967年2月22日，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强力干预和撮合下，首都“红代会”（即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成立，原来的“首都一司”、“首都三司”和“首都二司造反联络站”实现了名义上的“大联合”。当天，这份《东方红》出了其“终刊号”。

这份期号为“第21号”的“终刊号”，第2版刊有一则《致读者》的“终刊启事”，全文如下：

致 读 者

亲爱的革命造反派的读者同志们：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了一个关键时刻——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举国上下，形势一片大好！目前，由首都一司、二司革命造反联络站、三司的革命造反红卫兵联合筹办的“首都大专院校革命造反红卫兵大会”的胜利召开，这是红卫兵和一切革命同志的一件大喜事，她标志着首都的红卫兵运动进入了一个更新的阶段，她将为北京工农兵大联合大夺权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由于“红代会”的成立，我二司革命造反联络站主办的“东方红”报已完成了她的历史任务，今后将由“红代会”主办的新报取而代之。

本报自去年11月7日造了原二司总部的反后，从第六期开始获得了新生。这段时间以来，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国各地革命红卫兵小将、工

人、农民、解放军同志的热情帮助和积极支持下，“东方红”小报已出到第 21 期。每当我们接到来自福建前线，天山南北，中印边界那洋溢着革命豪情的信件，每当接到那来自工矿农村，机关单位，学校街道以及各地革命同志发来的鼓励、批评的信件、电报、电话时，我们都非常激动，全国革命造反派的支持和帮助，使我们浑身都充满了力量，我们就是要那革命造反派的脾气，就是要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喊大叫，鸣锣开道。但是由于我们毛主席著作学得很不好，经验甚少，水平有限，框框重重，所以问题不少，错误甚多。今后，还希望同志们多批评，指教，有什么问题可与“首都大专院校革命造反红卫兵代表大会”宣传组联系。

在这里，我们二司革命造反联络站向全国各地一切关心、支持、批评，投稿的革命同志们表示最深切的感谢，向你们致以最崇高的革命造反红卫兵的战斗的敬礼！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一切革命的同志们，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披荆斩棘，共同携手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这份《东方红》“终刊号”的第 3 版，整版篇幅刊载的即是那幅题为《群丑图》的大型政治漫画，漫画制作者署名为“斗争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筹备处宣”。另有一则数百字的“编者按”：

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一伙是特大号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刘、邓之流的资产阶级反动黑线由来已久，它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它在社会上的流毒和影响，决不能希望在一朝一夕，开几次大会，写几篇文章就能彻底清除。我们务必清醒看到这点。敌人必将完蛋，敌人不打不倒。“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我们要把

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一切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统统挖出来，打入十八层地狱，叫它们永世不得翻身！打倒刘、邓、陶！打倒彭、罗、陆、杨、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漫画上被丑化攻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知名人士共有 39 人，分别是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薄一波、李井泉、李维



汉、刘澜涛、王任重、林枫、安子文、刘仁、万里、钱信忠、吕正操、刘志坚、梁必业、肖望东、何长工、肖向荣、蒋南翔、周扬、夏衍、田汉、林默涵、齐燕铭、阳翰笙、邓拓、吴晗、廖沫沙、陆平、陈鹤桥、王光美、严慰冰等。

这些被攻击丑化的数十人中，上至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军队元帅、将军，下至部长、副部长级领导，囊括党政军各界及知名人士。一幅漫画打击面如此之广，可谓前所未有。据傅崇碧回忆称：毛泽东见到此画后十分生气，说：“这是在丑化我们的党！这种东西不准搞！”又立即叫秘书打电话给陈伯达，让中央文革小组将此图全部收起来，不准在社会上流传（见《傅崇碧回忆录》，中央党史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99 页）。此事当时并未传达出来，因此外界并不了解有此“最高指示”。不过，就在发表此画的《东方红》报出版几天之后，中央领导人就陆续在讲话中明确提出了批评。2 月 27 日，陈伯达在接见原首都三司部分代表时的讲话中说：“还有什么百丑图、群丑图，这都被香港……被坏人利用了，值得我们警惕，”次日，谢富治（与傅崇碧一起）接见首都职工革命组织代表时的讲话中说：“街上传单的东西不要搞互相攻击，不要搞喷气式，不搞群

丑图或画漫画。这些东西，我们毛主席从来是反对的，不提倡的，中央文革向来反对的，不提倡的。”3月3日，周恩来在总政治部机关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最近还有一些不应该的漫画，什么群丑图啦，罚跪啦，这样的照片，登在小报上，马上就传到了世界各国，丑化了我们的党和国家。这也是不应该，不允许的。”3月4日，谢富治与戚本禹在对北京各红卫兵小报和印刷厂代表的讲话中说：“什么‘百丑图’、‘群丑图’……他们本来一小撮，却被画成浩浩荡荡的队伍，这替谁宣传？”（以上讲话均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6年）

不过，中央的批评和禁止反倒增加了其知名度。这份载有《群丑图》的《东方红》“终刊号”，被收藏界炒到文革小报的最高价，也是理所应当的事了。

与日本红卫兵合办的小报《惊雷》

这是一份中国红卫兵与“日本红卫兵”合办的小报，其特殊性与价值，不言而喻。

文革时期，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其势如潮，不仅风卷残云般横扫中国大陆，甚至传至香港、澳门。并飘洋过海，远至欧洲、北美，都引起了反响回应。一些赶时髦的东洋、西洋青年，在并未真正懂得中国文革及红卫兵运动实质详情的情况下，也邯郸学步般戴上袖章，制作红旗，搞起了各式各样本土翻版的“红卫兵”。而各国在华留学生，则更是这些“洋红卫兵”的一支重要力量。

笔者收藏的一份特殊的文革小报，就真实记录了当年这些外国红卫兵参与卷入中国轰轰烈烈文革运动的部分详情。这也是笔者所见到的惟一一份当年由外国红卫兵与中国红卫兵合办的文革小报。

这份小报的报名叫《惊雷》，对开4版大报，报头套红印刷（报头系从毛泽东书赠访华日本朋友的鲁迅《无题》诗最后一句“于无声处听惊雷”中选字拼成），颇有大报风范。出刊于1967年8月3日，由“日本在京红卫兵”，与首都红代会下属的“北航红旗战斗队”、“中国人民大学三红”、“外交学院革命造反兵团”、“北外红旗大队”等4个红卫兵组织合办。其4版右下角，刊有一则《编者的话》，其文如下：

于无声处听惊雷。

革命的《惊雷》在北京响了，响了，响了！它将响彻日本岛国，响彻五洲四海，响彻全世界！

《惊雷》是中日两国红卫兵团结、战斗的结晶。

《惊雷》吹响了中日两国红卫兵向日修宫本集团宣战的进军号！

《惊雷》敲响了佐藤反动派的丧钟，判处了宫本之流的死刑！

让美帝国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以及牛鬼蛇神在我们《惊雷》声中发抖吧！

革命的日本人民和全世界革命派必将在隆隆的《惊雷》声中获得胜利，获得解放，获得自由，获得光明！

细读全文，这则《编者的话》，颇似“发刊宣言”、“创刊词”之类，基本上可以推断此为“创刊号”（但笔者未见以后其他期号的《惊雷》，暂不妄定）。

重要之处在于此报的排版及内容，几乎全是用中日两国红卫兵的名义，攻击声讨当时的日共中央领导层的文字和图片。按现在的观念来衡量，就叫做“粗暴干涉兄弟党内部事务”（还不说其中许多诬蔑、侮辱性的破口大骂之词）。

第1版头条通栏大标题是《在京日本红卫兵召开〈打倒日共宫本修正主义集团大会〉》，眉题是《富士山头喷怒火 北京城里响惊雷》。大标题下用黑体字标明的内容提要更是让人触目惊心：“愤怒声讨日修砂间、绀野及宫本反华集团反华、反共、反人民滔天罪行，大会强调指出，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日本革命的指南，日本人要解放，只有走武装斗争的道路。”公然号召鼓吹日本人民起来武装造反，推翻现政权，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第1版右下版面，是一篇题为《敢叫日本换新天》的社论。社论说：“继中国红卫兵之后，又一支英雄的红卫兵——日本在京红卫兵，英姿勃勃，威风凛凛地杀上了世界政治舞台。这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国际上发生深远影响，谱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又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

想的又一伟大胜利！日本红卫兵的诞生，给日修宫本之流当头一棒，粉碎了美帝国主义长期霸占日本的迷梦。她的诞生，是日本的新曙光，是日本革命人民的希望。”

最后，这篇社论以典型的“红卫兵语言”发出号召说：

“中日两国红卫兵战士们，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携起手来，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在共同的斗争中，结成坚固的革命战线，向着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杀！杀！杀！杀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光辉普照的新世界！”

从2版到4版，分别刊载有署名为“在京日本红卫兵代表”土肥民生的文章《从日修的造谣声明看反华群丑的狼狈处境》（配有土肥民生在大会上发言的照片）。署名为“在京日本人反帝反修联络会议代表”井出润一郎的文章《日修革命派的造反行动好得很》（配发言照片）。署名为“在京日本人反帝反修联络会议代表”国谷哲资的文章《把宫本、砂间之流的叛徒嘴脸拿出来示众！》（配照片）等。

更为奇特的是，这份《惊雷》小报第4版上方第一条位置，醒目刊载了一份《驱逐令》。这份《驱逐令》在引用了毛泽东关于“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等两则语录之后，以文革大批判式的语言，攻击日共总书记宫本显治为首的“日共修正主义集团”之后，指斥加谩骂称：“修字号的日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砂间一良和《赤旗报》驻京记者绀野纯一，是宫本修正主义集团的走狗，他们秉承其主子的旨意，在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疯狂的反华勾当”，为此宣布：“我们限令，砂间、绀野两个混蛋立即滚出中国去！不然，中国的红卫兵将对你们两个混蛋采取必要的革命行动。勿谓言之不预也！”

这份《驱逐令》，由首都红代会下属的北航红旗、人大三红等20多个红卫兵组织，以及中学红代会，首都钢厂东方红，和一些外地造反组织，甚至包括中央的国务院专家局，广播事业局、外文局、外宣部、建工部、化工部、国家经委、国家计委等国家机关的造反派共十多家组织共同发出，可见其荒谬。如果说学生红卫兵，只凭革命狂热还不大懂得起码的外交礼仪，以及处理兄弟党之间关系的政策规定的話，作为国家机关的干部就不可能一点不知道，这种粗野狂暴，甚至是很恶毒地对待驻华外国人士的举动，对世界共同遵守的国际交往准则以及个人

基本权利是粗暴无理的践踏。

这份小报的第4版，还刊有一则《特快消息》：

八月三日下午在北京的日本红卫兵、日本革命派和北航红旗、人大三红等中国红卫兵战士，同仇敌忾，将在东郊机场举行斗争日共修正主义分子砂间一良和《黑旗报》(笔者注：应为《赤旗报》，这是有意将其丑化的文革手法) 记者绀野反华的大会。会上，将彻底揭露日共宫本之流的叛徒嘴脸，痛斥砂间、绀野纯一的无耻谎言。并立即把这两个混蛋赶出中国。

发这则《特快消息》，实则是煽动红卫兵造反派赶到东郊机场去参加对这两位日共人士的围攻批斗。果然，当砂间和绀野在机场登机离开中国之前，又遭到大批红卫兵粗暴的批斗围攻。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份中日红卫兵合办的《惊雷》小报，都是那个特殊时代留给后世的珍贵的文献资料。这也是这些狂热无知的红卫兵试图将文革国际化，进而异想天开地搞“世界文化大革命”的有力证据。

“开天窗”的文革小报

文革小报居然也被迫“开天窗”，可能对许多人来说闻所未闻，甚至觉得不可思议。然而，笔者收藏的一份开了“天窗”的小报，就说明文革时期小报“开天窗”的事件实实在在发生过。

所谓“开天窗”，是新闻报业内带点幽默味和反抗意识的一个流行术语。意指某份报纸已制好版的某篇文章，未通过新闻检查而被撤下，报社编辑无法抗拒，却又在新闻检查制度下，心有不甘，就故意不补上另外的稿件，将已排版那部分位置“开天窗”(即留下空白)。这样，印好的报纸送到读者手中，聪明的读者就心领神会，明白这里有一篇文章未通过新闻审查而被“枪毙”，从而产生对当局扼杀言论自由的不满，以及对报社和编辑的同情与敬意。民国时期，一些有正义感的报人就时不时用“开天窗”的做法抗议国民党当局对报纸的新闻检查。中国报刊史上最著名的“开天窗”事件，当数“皖南事变”后的《新华日报》。中共

在革命传统教育中曾向青少年反复宣传周恩来当年如何领导《新华日报》以“开天窗”的手段与国民党当局斗争。

不过，文革时的小报开“天窗”，却确实极为少见了。众所周知，文革中红卫兵、造反派办的小报，尽管印刷时须有一些手续（有的甚至连这点手续也没遵照执行，成了想印就印），但其内容一般是不经过审查的。况且，两派对立时，各自都控制着相应的印刷单位，或者可以到外地找同观点的派别帮助印刷。故此，不存在某份报纸某个内容通不过审查造成“开天窗”的情况。

然而，世界上任何事情均有特例。笔者收藏的一份四川成都地区由四川师范学院造反组织主办的《九七战报》，其第23期，就是一份故意“开天窗”的文革小报。这也是笔者所见起码上万份（不是上万种）文革小报中，惟一一份留有“天窗”的小报。

《九七战报》是由四川师范学院红色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和红卫兵成都部队川师支队、川师毛泽东主义战斗团联合办的4开小报，创刊于1967年1月。至6月下旬，已出刊至20多期，还算是小报中出报较多者。在成都上百家小报中，其影响和势力，属于中等。但是，1967年6月28日出刊的《九七战报》，却在第4版醒目位置留下一个大约1/8版面的“天窗”。

更引人注目的是，“天窗”位置，印有两段文字，横竖各一段。竖排者为“立此存照”4个标题大字。横排者为仿宋体排成3行的文字：

因受某种阻力，川大八·二六英雄在中和场举手投降之照片暂时无法刊登。

特向读者致以歉意！

编者谨启

读过这段文字，读者方可恍然大悟，原来编辑排版时此处有一幅照片，内容是川大“八·二六”有关人员在中和场被俘时举手投降之照。因通不过相关部门的审查（“受某种阻力”），被迫撤下了，故此留下“天窗”来“立此存照”。

这个“开天窗”事件，具体起因是5月19日的“中和场事件”，但其背景比较复杂，涉及《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即《红十条》）和成都地区

3 派群众组织。即被《红十条》定为“为一些保守分子所蒙蔽、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背后操纵的保守组织”的成都“产业军”，以及造反派内部已经严重对立的“八·二六”派和“红成”（红卫兵成都部队）派，3 方的矛盾冲突和斗争，都在这个“中和场事件”中得到反映。

“中和场事件”，其实仅是文革时期成都一系列武斗事件中，很小的一个事件，大致经过情形是，1967 年 5 月 6 日成都发生一三二厂武斗事件后，次日《红十条》正式公布，“产业军”遭到沉重打击，但许多人坚信自己是革命的，认为中央受了蒙蔽，一面设法向中央申诉，一面避开造反派打击的锋芒撤离成都市区，与市郊的“贫下中农战斗军”联合对抗造反派，5 月 19 日，川大“八·二六”4 个分团，及成都 19 中“八·二六”和部分成都工人造反兵团成员计 2000 余人，原拟赴琉璃场抢收抢割“支农”。到琉璃场后，因雨大临时改往中和场宣传《红十条》，队伍全部进场后即被“产业军”及“贫下中农战斗军”包围。这 2000 多人，主要是八·二六派学生。其中一些人被俘，部分人员还被“产业军”转至属于乐山地区的仁寿县关押，经成都军区出面交涉，几经周折才获释。

“中和场事件”无重大人员伤亡，本身不值一提。但那么多“八·二六”人员竟然投降被俘，就成了造反派内部的一桩“丑闻”。特别是那些举手投降的镜头被人照相记录在案，成了被对立派别攻击指责的“丧失造反派气节”的“证据”。

成都“五·六”事件之后，成都市内成了造反派的天下。“外敌”既消，原来造反派内部就一直存在的“八·二六”和“红成”两大派别的矛盾，顿显尖锐和公开化，相互之间经常抓住一些问题大做文章。“中和场事件”正好为“红成”派攻击“八·二六”提供了“炮弹”。

在《红十条》下达前后，川大“八·二六”及首都红代会等已经大肆宣扬“八·二六”战士如何在“二月镇反”中坚强不屈，英勇战斗，“乐在天涯战恶风”，这已经使“红成”派的气不打一处来了，如今有那么多“八·二六”战士在死敌“产业军”面前表现如此“狗熊”，自然该大做文章。川师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是“红成”的骨干团队。不知通过什么途径辗转搞到了川大“八·二六”人员在中和场举手投降的现场照片。6 月 28 日出刊的《九七战报》第 23 期，第 4 版一个整版都是以“中和场事件”为背景攻击川大“八·二六”的。这幅现场照片，就成了最有说服力的材料之一。这一版的其他文章还有《来自八·二六内部的声音》，

系经历了“中和场事件”的一位“八·二六”战士，在6月6日川大“八·二六”内部整风大会上的发言摘录。其中谈及当时详情及为此对“八·二六”头头的批评指责。不知如何也被川师“红成”支队人员搞到手，并在小报上公之于众。另外还有一篇评论《叛徒就是叛徒》，攻击“八·二六”投降之举是“叛徒”行为，及一首题为《某团长自哭》的“散曲”。《九七战报》还加了一则攻击性很强的“编者按”。

然而，这期《九七战报》送印时，却遭到意外障碍。据悉，省革筹小组办公室派人直接过问此事，坚决不准这幅照片见报。其时，由《红十条》决定建立起来的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刚刚开始运作，是全省最高权力机构。省革筹小组出面干预，川师“红成”支队头头不好不听，只得将照片从已发排的报版上抽下。不过，又不甘心屈从，就有意留下一段挑明事实真相的文字，实际上已将照片内容公之于众，达到了部分目的。

省革筹小组办公室干预这件事的理由很充分，也很正当，说是从团结出发，不要因此而激化矛盾，加剧两派的对立。这是可以摆在台面上的明的理由。此外，还有不能摆上台面的倾向性。其实，省革筹办公室从成立之时起，观点立场上，就相当倾向以川大“八·二六”战斗团为核心的“八·二六”派（其工作人员大多从“八·二六”派中选调）。在处理许多具体问题上，这种倾向性十分明显。其深层原因在于直接掌管省革筹小组办公室，负责其日常工作的“刘、张”（即刘结挺、张西挺夫妇），自参加中央处理四川问题会议后，即按照中央的精神，与以川大“八·二六”为首的“八·二六”和“兵团”派关系密切。本来，1966年底至1967年初，让刘、张赴北京告中共中央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主要领导的状，在北京谋求为刘、张翻案平反的，主要是成都的“红成”派学生。但中央处理四川问题时的态度明显支持在“二月镇反”中受到打击的川大“八·二六”和“兵团”，刘、张刚被中央“解放”出来，焉能不看中央眼色行事？当时有消息说，是川大“八·二六”头头得知“中和场事件”照片全部被《九七战报》曝光，担心此“丑闻”太影响其形象，遂紧急求助于省革筹办。后者对“红成”总部及川师支队施加了压力，于是便有了这份“开天窗”的红卫兵小报。

这是笔者所见到的惟一份开有“天窗”的文革小报。

期号相同版式内容却不同的两份清华《井冈山》第8期

同一期号的某份报纸，不管该期印1万份还是10万份，其每份的内容及版式都应该是一模一样的，绝不可能从中找出两份期号相同，却内容及版式方面有较大区别的报纸来。

然而，文革期间出的小报，却竟然有这种“奇事”出现。当然，在数以万计的文革小报中，这也是极为罕见者。

清华《井冈山》应当说是当年在北京及全国最有名气，影响最大的红卫兵小报之一，其印刷量大，发行面广，又有几个大城市的“航空版”，因之经常出现同期号报头印刷不同的清华《井冈山》的现象。笔者就收藏有好多份这类《井冈山》小报，即某期号的《井冈山》，一种是报头及相关部分套红印刷，而另一种却是全黑色非套红。这本身就构成了“奇事”，但更奇的却是，笔者竟然发现有期号相同，而内容版式存在很大区别的清华《井冈山》。这更是中外报刊史上闻所未闻的荒唐事。

这期与众不同的《井冈山》，是1967年1月7日出刊的清华《井冈山》第8期。这期《井冈山》出刊后即比较引人瞩目，是因为公开披露了一周前江青那次非同寻常的清华之行的相关情况。江青1966年12月30日清华之行，对清华大学的蒯大富等头头及其井冈山兵团，是一件值得大吹大擂，炫耀于世的重大资本。为此，元月7日出刊的《井冈山》第8期在这方面做足了文章。

这两种内容版式不同的《井冈山》第8期，因无法分清哪一份才是最早排定的“正版”报，因此姑且将其分别称之为“版式1”和“版式2”，以便于叙述。

“版式1”报头右侧，是毛泽东《卜算子·咏梅》词。表面看，这是象征送旧迎春，其实，深层看，编者选这首词在报头醒目处，意在吹捧讨好江青。“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联系其下的文章标题及内容，这里的“梅花”，和“她”，已无疑是借喻江青了。

“版式1”第1版头条，是套红印刷而十分醒目的江青清华之行的报道，题为《伟大的号召，巨大的鼓舞》。标题下黑体字提要为：“江青同志到清华，《人民日报》、《红旗》元旦社论的发表，大大鼓舞全校革命师生的斗志，决心更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刘邓反动路线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文章开篇即说：“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在这伟大的1967年即将到

来之际，江青同志及中央文革的其他同志给我们带来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问候”。其后又写道：“寒冬在清华园一片热气腾腾的空气中仿佛要融化了。江青同志的亲切慰问，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师生的革命斗志，我校广大革命师生久久沉浸在无比欢乐和幸福之中。”

显然，这篇宣扬江青清华之行的文章，是这期《井冈山》的重头戏。“版式1”第1版还有一篇题为《克服革命队伍内部的几种错误思想》的学习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心得，该文较长，再转第4版。之后的第2版是批陶铸的两篇文章：《陶铸十大罪状》、《陶铸论陶铸》。第3版是一篇再转第4版的刘少奇女儿刘涛的长文《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第4版则是第1、3版文章的续完，无另外内容。

“版式2”的排版却明显不一样，报头右侧仍是毛泽东《卜算子·咏梅》词。但第1版内容却与“版式1”有很大区别，原占据第1条位置的《伟大的号召，巨大的鼓舞》放到了下半版的第2条位置，第1条取而代之的是一篇题为《清华园内春来早》的“本报编辑部”文章。而原载第1版的那篇“学习心得”《克服革命队伍内部的几种错误思想》被挤到了第3版。第2版批陶铸的两篇文章不变，版式亦未变。原在第3版的刘涛文章则放到了第4版再转第3版（整篇文章字体改为6号字，行距也更紧密，勉强将文章排完）。

由此比较，清华《井冈山》第8期的“版式1”与“版式2”，除第2版未作改变外，整个第1、3、4版内容和版式都有很大区别。乍看起来，甚至可以说是两份全然不同的报纸。然而其期号和出版单位、出版日期却一模一样，这真是构成了中外报刊史上前所未有的“奇事”。

从整个内容来分析，这期《井冈山》“版式1”与“版式2”的全部区别在于，“版式2”多了那篇题为《清华园内春来早》的编辑部文章。但因其增加了这近2000来字，且所用字号大，占版面较多，编者不得不对其他版面作伤筋动骨的较大调整，所以让“版式2”与“版式1”比较起来，似乎面目全非。

编者（或者说井冈山兵团头头蒯大富等人）特意增加这篇《清华园内春来早》的“本报编辑部”文章，其意图只有一个，加大对江青的吹捧力度和分量。整篇文章谈的都是江青清华之行的“伟大意义”，文章标题也是借题颂扬江青，因其来到清华，故此“清华园内春来早”。不到2000字的文章，江青名字出现达8

次之多，甚至超过提到毛泽东的次数。其中，一头一尾对江青的吹捧尤为肉麻。其开篇，连续两个自然段都是直接颂扬江青：

元旦前夕，江青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关锋、王力、姚文元同志来到我校，会见了全校革命师生。这是毛主席对我们最大关怀！喜讯传来，革命同志扬眉吐气，奔走相告。人们一次又一次欢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十二月三十日，这是一个喜庆的日子。江青等同志来清华，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事情。是值得大书特书，大庆特庆的大喜事！

“编辑部文章”结尾，是这样几个排比句：

江青同志来校，宣告了刘邓路线在清华统治的破产！

江青同志来校，表示清华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江青同志来校，给清华带来了新的春天，“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辉灿烂的世界，就在面前！”

在这里，江青不仅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可以与毛泽东相提并论，平起平坐的政治“领袖”，而且简直成了挽救一切的“救世主”。这份清华《井冈山》报，将文革中对江青的吹捧，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笔者仔细分析了这两份内容版式不同的清华《井冈山》第8期，初步可以确定，“版式1”是该报先排定的“正版”，而且已经按时于1967年1月7日付印（或部分付印出刊）。而且据此推断，之所以造成有两种内容版式很大不同的《井冈山》第8期同时面世，其原因可能在于“版式1”的出刊（或正在付印出刊）之时，以蒯大富为首的井冈山兵团头头（或者就是蒯大富本人）突然改变了主意。大概觉得“江青清华之行”这件事，其文章没有做够，对江青本人的吹捧颂扬的力度不够，因此临时决定增加这篇大吹特吹江青的“本报编辑部”文章（其实那

篇《伟大的号召，巨大的鼓舞》报道及提要，已对江青清华之行作了大肆吹捧颂扬)，并将这篇编辑部文章刊载于第1版头条醒目位置。故此不惜对《井冈山》第8期重新拼版，抢时间付印出刊。因之才有了这清华《井冈山》第8期的“版式2”出现。

笔者进一步推断，这“版式2”《井冈山》印量比“版式1”大得多（笔者见到的清华《井冈山》第8期，大多是“版式2”），而且，通过“首都三司”这个渠道送给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组，以及转送毛泽东本人的清华《井冈山》第8期，也多半是“版式2”。

绝无仅有的“地图战报”

这种《地图战报》，之所以称为“绝无仅有”，是因为其每期小报，都是以特殊的规格版式出现，既是小报，又是一份不可多得的“文革地图”。而且，每幅地图，都带有文革思潮支配下的政治内容。

《地图战报》由北京工代会下属的地图出版社革命委员会《地图战报》编辑组编辑出刊。创刊时间不详（大致在1967年3、4月间）。笔者迄今只搜集到其中数期。查杜永平、周连成编《文革小报目录》，其中北京地区第201号即是，收录的是1968年1月出刊的第13期。可见其1968年仍在出刊，已出至10多期。笔者这里仅介绍比较有代表性的第3期及第9期。

《地图战报》每期都有一份印制精美的彩色地图，8开大小，双面套红印刷，用纸也是100K专用磅纸。乍看之下，就是一份可随身携带的小型地图。仅在左下角，可见到“地图战报”的报头及期号、出版单位等内容，方明白这是一份特殊的文革小报。

《地图战报》第3期，是一份带有浓厚文革色彩的北京地图。正面左上方，有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着军装检阅游行队伍照，旁边是那段关于文革的著名语录：“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其下，整版是《北京市地图》（区域图）和《北京市城区街道图》。《北京市地图》表面看来似乎与文革前的北京地图无多少变化，但细看之下，《北京市城区街道图》则大有名堂：北海公园变成了“工农兵公园”，旁边的景山公园已改为“红卫兵公园”，原日坛公园已更名为“向阳公园”。著名的颐和园，图上则标明为“首都人民公

园”，陶然亭公园更名为“劳动人民公园”，老北京人人知晓的天桥剧场，地图上已改为“红卫兵剧场”。

地图上北京的街道名，更是改得五花八门。小举几例：

原张自忠路、地安门东大街改为“工农兵东大街”；原地安门西大街，更名为“工农兵西大街”。德胜门内大街，改为“人民公社路”；地安门内大街和地安门外大街，改名为“总路线路”；安定门内大街和交道口南大街，改名为“大跃进路”；西什库大街更名为“集体化路”；东环北路改名为“大寨路”。原石桥路、中关村路和海淀路南段，更名为“文革路”；景山东路与景山后街东段，更名为“代代红路”；百万庄东段，更名为“宇宙红路”；景山西街更名为“育红路”；东四十条更名为“卫东路”；雍和宫大街更名为“红日北路”；月坛北街更名为“红塔路”，月坛南街更名为“灯塔路”；南池子大街和北池子大街，更名为“葵花向阳路”。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西交民巷更名为“反帝西路”；东扬威街更名为“反修路”；北佳村路改名为“志远路”；复兴路改名为“解放军路”。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大都是文革初期红卫兵的“杰作”。在“破四旧”的热潮中，这些改动已经得到当时党政机关的认可和“热情支持”。而作为专业机构的地图出版社，则在其编绘的最新《北京市城区街道图》上，将这些新街名、路名正式标志出来。

有意思的是，这份《地图战报》第3期的背面，分别是《北京市汽车路线图》、《北京市电车路线图》、《郊区公共汽车路线图》和《北京市长途汽车路线图》等4幅简易交通路线图。这4幅交通路线图，文革味较少，或者说基本上没有。在《北京市汽车路线图》上，许多地名仍沿用旧名，似乎没有来得及变更或因担心乘客不知道新地名而没有变更。仅有“反修医院”、“反帝西路”是文革新地名。

这期《地图战报》，既然为“战报”，在其刊登6幅“地图”之外，也还有相关的文字内容，这就是题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的一篇介绍北京市情况的资料性文字。细读之，竟没有一点关于北京地理环境、历史文化、物产资源、旅游景点方面的任何资料性介绍，却全部是狂热万分的文革内容和文革词语。除第一段属于叙述中国革命历程外，其他几个自然段的中心内容分别是：“北京是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居住的地方。是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圣地。”“北京，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北京，是威

震世界的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北京，是世界革命人民的希望和灯塔。”这篇介绍北京市的文字资料，最后是这样结尾的：

全国人民，全世界革命人民日日夜夜仰望着北京，想念着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聆听着伟大领袖毛主席从北京发出的战斗号召，真理的声音。毛主席啊，毛主席！在您的英明领导下，我们一定要把伟大祖国的首都建设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不过，由于刊有北京街道图及4幅行车路线图，这份《地图战报》在当时还是颇有些实用价值。笔者收藏的这份第3期，就是和现今的各种城市地图或旅游图一样，因被人反复折叠以放入口袋而留下了折痕的。

《地图战报》第9期出刊于1967年11月，其主题是毛泽东著作各篇写作的地理历史背景，以及毛著毛选在各地的出版传播分布情况。所刊两幅地图，也是围绕这个主题绘制的。

这两幅地图。正面是一幅题为《〈毛泽东选集〉写作地点》的示意图，分别注明从毛泽东在广州写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起，《毛泽东选集》1-4卷中各篇著作的写作地点，写作时间及篇数。从1926年3月在广州写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选》第1卷第1篇），到1949年9月16日在北京写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破产》（《毛选》第4卷最后一篇），20多年间写作情况的详细资料数据，均在地图上一一标明。其间，共历经广州、武汉、井冈山、上杭、瑞金、瓦窑堡、保安（今志丹县）、延安、青阳岔、王家湾、朱官寨、神泉堡、杨家沟、兴县、平山西柏坡、北京等城市和小地名。其考证得如此详细具体，说明编绘者倒是很下了一番功夫的。

《地图战报》第9期的背面，是一幅占据全部版面的世界地图。不过，这幅世界地图有些特别，它不是通常意义下的实用性地图，而是如其标题《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照红全世界》所揭示的那样，展示的是所谓“毛泽东思想光辉”如何照遍了全球七大洲四大洋的每一个角落。为显示这种“照红”、“照亮”的效果，地图上的中国标为大红色，其间有一幅相当于1/4个中国大小的毛泽东着军装头

像。然后，全红色的中国之外的空间，均被以中国为中心向外呈发射状的红色细线所布满，象征毛泽东思想光辉向全世界发射开去。除海洋之外的世界所有陆地、岛屿，全部呈浅红色，象征其已被“毛泽东思想”的光焰“照红”。图中，附有一段文字说明，统计的是中国国际书店，文革以来对外发行毛泽东著作外文版的情况，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出版发行《毛著》、《毛选》，以及《毛语录》的一些数字。这段文字最后称：“从硝烟弥漫的东南亚丛林到高山峻岭的南美洲安第斯山山区，从非洲的南角到地球北端的冰岛，到处都放射着毛主席著作的闪闪金光。”

除两幅地图外，第9期《地图战报》也刊有一篇文章，以展示其“战报”本色。这篇题为《伟大舵手毛主席指引航向，世界革命前程无比辉煌》的文章，以不太长的文字，尽现了小报文章那种“批判”加“颂扬”的典型特点。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颂扬伟大领袖毛泽东及其“光辉思想”。称发动文革以来的1年零3个月（1966年6月至1967年9月），“已出版了毛主席著作1477万册，为以往十七年总印数的一倍半，一年超过了17年”。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以这种格式和特征面世的《地图战报》，无疑是文革小报中少见的精品，收藏与研究价值俱佳。

节录自作者书稿《中国文革小报研究》。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史林一叶】

批判相对论轶事

杜钧福

1967年底，到湖南串联的北航《红旗》红卫兵在当地发现了一位相对论批判者周友华，把他当作宝贝带到北京。周是湘潭的一位中学教师，当时致力于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周到北京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物理所的革命委员会派一位青年科技人员帮助他弄请自己的思路，但二人合作得并不很愉快。原因是周认为自己是“小人物”（“小人物”是受到毛泽东赞赏的，那时是个像“革命小将”一样

很光荣的名称)，有一种政治上的优越感，并视合作者为“反动学术权威”。

1968年初，在中科院物理所的四楼礼堂召开辩论会。到会的除周友华以外，还有物理所及中国科学院其他所及科学技术大学（当时还在北京）的一些人。先由周阐述他的论点，然后大家发言表达自己的意见。

一般来说，批评意见多于支持意见。物理所的人几乎全都反对他。科技大学有一些老师支持他。院革命委员会成员陈小虹也表示支持他。

过了一段时间，在原来地点又召开会议。原来以为还是辩论会，到那里一看才知道周友华没来，不知何故。但与会者仍继续表达对这一问题的意见。这次几乎是一边倒，全都批评周友华。陈小虹也撤回了自己的支持意见，说上次表态不很合适。

两次会议上的反对意见都是先表扬后批评。他们这样说：周友华将毛泽东思想用在相对论研究上是非常好的，但是他的观点在科学上是有错误的。针对这种说法，笔者也在这次会议上发了言。我说，周友华宣称他将毛泽东思想用在批判相对论上，并不能表明他真想这样做，即使他真想这样做，也不能表明他真这样做了。按照毛泽东思想，事物的运动是其内因推动的，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现在周友华说，热的物体重量较轻，就是将两种物质运动形态混淆了。热运动对于重力来说是外在的因素，不会直接发生影响。

我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我知道对于周友华这样的人，必须打破他的政治优越感，才能批倒他的错误，光讲科学批不到位，只能以“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思想”。

但是可惜周友华未能听到我的意见。后来就没听说他的消息了，也许回湖南了。

这次会议后，批判相对论的群众运动阶段结束。等到大家快忘记此事的时候，却听说科学院成立了一个批判相对论小组。是怎么成立起来的，大家不很清楚，虽然觉得有些好笑，但也感觉没什么。小组成员大家都认识，知道他们对物理还是明白的，不至于犯周友华那种低级错误。再说科学无禁区，相对论又不是不可批判的。当时科研工作陷于停滞状态，呆着也是呆着，让他们批判去吧。

另一好笑之处是，当时如火如荼开展的大批判运动正在批判理论脱离实际，理论室都解散了。科学院的四大任务都是黄淮海治理一类非常实际的课题。而在

这个时刻，一项离实际最远的研究项目却蓬蓬勃勃开展起来了。

大概在 1969 年底，他们弄出一个本子。不很看得懂，但确实有荒谬之处。后来就听说几位老科学家委婉地表示不同意，事情就过去了。这说明当时领导确实还算明智。但是后来上海有一帮人接着批，这批判战场就转移到上海去了。

批判相对论与造反派保守派无关。不管什么派，只要有一点科学知识，都觉得是笑话。至于上海那些人，很难说是造反派。但科学院那个批判小组里的人如何想，我不很清楚。改革开放后，有该小组中人郭汉英先生应邀对台湾《物理》杂志发表谈话，说他们其实是很反对批判相对论的，只不过是钻进去当内应。

近年来才听说批判相对论有陈伯达的因素，当时我们不知道。只是在批林批孔的时候，有人给总理联络员刘西尧贴大字报，说：听说毛主席对批判相对论有批示，如果有，你刘西尧为什么不传达？

所以此事毛泽东是否表过态，还是个悬案。

批判相对论的笑话，从那时起直到现在还在不断上演，只是不再贴“毛泽东思想”的标签了。但当事人仍经常以掌握了真理但被控制着科学界大权的（反动）学术权威所压制的身份出现。这一点和文革时代相同。

【口述历史】

从“现行反革命”到“英雄战士”

——康育义教授访谈（节录）

被访谈人：康育义教授

访谈人：董国强、梅雪盈

访谈时间：2006 年 5 月 10 日

访谈地点：南大中美中心 D104

[康育义：南京大学地质系退休教授。曾任南京大学东方书画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岩画研究中心研究员、印度英·甘地国立艺术中心顾问。文革爆发时是南京大学地质系青年教师]

康育义：文化大革命怎么来的我们也搞不清楚，我当时只知道努力完成教学科研任务。这个信念是非常强的。其实 1966 年 5 月上旬我在北京，而且就住在北京大学的专家楼里面。当时我们有一本《古生物学》教材要出版，系里要我去参加最后的审稿、定稿工作。我们在那里的时候整天都在专家楼里面专心地开会讨论书稿，对北大校园里和社会上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5 月中旬工作结束，我就从北京返回学校继续给学生上课。

到了 6 月初，突然文化大革命就来了。6 月 1 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大揪出陆平的消息，6 月 2 日南大学生就给匡亚明贴大字报。后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匡亚明校长打成“反革命黑帮”。我们这些理科的人整天只知道搞业务，对于政治向来不大关心，所以匡亚明突然被打倒了，我们感到莫名其妙。当时匡亚明在溧阳分校的情况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我们的校长被打倒了，事情看来似乎很严重。后来形势发展得非常迅速，红卫兵很快就出来了。

当时我们南大教师中出身不好的占大部分，我们古生物地史教研室 17 个人中有 12 个出身不好。当时群众的观点分为两派，即“造反派”和“保守派”，我们的观点是倾向于“保守派”的。我们哪敢造反啊！不过当时“保守派”组织也不接纳我们。保守派成员的社会成分是绝对的纯，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学生干部，他们害怕我们把他们沾腥了。因此尽管我们的观点倾向于“老保”，但是我们也不能跟着他们去贴大字报，或者去参加他们的大会，人家不要我们。

到后来发生武斗了，学校里就没有人管事了，整个陷入无政府状态。我们这些人怎么办呢？没有人领导了，我们只好自己领导自己。即使在造反派、保守派打派仗的时候，我们也是自己做自己的事情，教研室自己组织活动。等到同属造反派阵营的“红色造反派”和“八·二七”把“老保”组织“红旗战斗队”打垮了之后，他们自己又打起来了，我们仍然是独立活动，尽管我们的观点比较接近“红色造反派”。

接下来就是“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和深挖“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我们系里也清理出所谓的“反革命集团”。这其实是文革派性斗争的一个表现。有些党员在文革前凭借党的信任接触到系里的人事档案，这个时候为了打击异己势力，就将一些个人档案抛出来整人。到了后来深挖“五·一六”

的时候，我们这些人全倒霉了。当时“八·二七”是当权派，他们就把“红总”这一派统统打成“五·一六”。因为我们这些人倾向于“红总”，所以我们也就被怀疑是“五·一六”。

到1970年前后，深挖“五·一六”的运动搞得非常紧张。我那个时候已经被怀疑是“五·一六”，所以1969年10月份我随南大师生去溧阳农村以后就回不来了，就受到变相监禁了。对我来说文革中最伤心的事就是这一段。

我的夫人在南京妇幼保健院工作，是护士长。我的大女儿是1965年出生的，1967年又生了第二个孩子，是个男孩，到我下溧阳农村的时候才两岁。我和爱人平时非常疼爱孩子。当时工资不高，但是我们总是给他们买最好的衣服，比如当时市面上刚出现的那种带硬领子的的确良儿童衬衫，7块钱一件，相当于工资的1/8，但是我不在乎，买给孩子穿。

我当时受到管制，不准我回来看他们，这是非常不人道的。我夫人在医院里的工作任务十分繁重。另外她既要管家里的事，又要带孩子，还要为我伤心，所以她所经历的艰难困苦是难以想象的。况且我的岳父岳母当时已经六、七十岁了，也需要人照顾。我当时很伤心，老是暗暗地问自己：我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呢？

我岳母因为我的原因，很长一段时间精神恍惚，有一次出去买菜跌了一跤，把手摔断了。我的爱人就写信告诉我，要我无论如何回来探望一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专案组都不让我回来。他们说是不好好交待，不能回去！就这么狠心！

我的夫人有一位同事的丈夫是南京市交通局的科长，有一次他帮忙联系到一辆去溧阳的交通车，就让他们儿子（十几岁）带着我的小儿儿子到溧阳东王庙来看望我。一开始专案组不准我们见面。他们利用这个来要挟我：只有老实交待问题，才能跟孩子见面！他们还跑去跟小孩子讲，见面时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你想想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带着一个两岁的小孩，他们那里懂得这么复杂的事情啊？把小孩子吓得不知该怎么讲。后来见了面，我一把抱住儿子，一阵心酸，眼睛里的泪水就流下来了。但我没有哭出声来。

我因为非常爱我的儿子，这个时候就感到很愧疚，也感到了一种侮辱。我在他那很幼小的心灵里究竟留下了怎样一个印象啊？现在一想起这些来我还是很难过。当时那种没有人性的残酷的现实，对我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我从这个事情中还得出一个结论：一个人的人格品行好不好，平时是看不出来的。平时大家人

看起来似乎都是道貌岸然、风度翩翩的。可是在这种特殊的时期，每个人的本性就暴露无遗了。我觉得这场运动把我们国人的良知都吞噬了，把同事之间的那种自然的亲密友善关系完全破坏了。

那么到后来我为什么会反对“四人帮”，还被抓起来坐监狱了呢？

1976年春，我又受领导指派参加了一个研究考察项目，这个项目是国家科委下达给我们学校的，题目是“普定县地下水调查与开发利用研究”。普定县位于贵州中部，是贵州高原上的一个分水岭，北边的雨水向北流入乌江汇入长江，南边的雨水向南汇入北盘江进入珠江水系。不过贵州高原上的分水岭地面倾斜不太明显，肉眼是看不出来的，是一个喀斯特平台。喀斯特地形区本来就缺水，平台顶部的地表就更没有水啦。然而在这个大平台上居住着一个县的老百姓，因为没有水，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就很困难，是一个全国有名的贫困县。所以当时贵州省就向国家科委汇报，说普定县表面没有水，但是地底下有水，希望能够派一些专家到当地调查研究一下地下水的开发利用问题。

国家科委就把这个任务交给南大地理系。由于这个研究课题需要先搞清楚当地的地层分布，而划分地层在我校地理系是弱项，于是他们就向地质系请求援助。那么普定县当地的地质构成主要是石灰岩，从泥盆纪到三叠纪连续沉积了五、六千米厚的石灰岩，要把它们分辨出来并不容易，而我恰好对那段地质时代的地层情况有较多的研究，所以上面就点名要我去参加这个研究项目。这样地理系加上我共去了六个人。

我们大概在3月初到了普定县。当时全国正在大批特批所谓“唯生产力论”。因为邓小平复出以后一直搞整顿，抓发展生产，引起“四人帮”的强烈不满，他们就指责邓小平是“唯生产力论”，用生产来压革命。

我们到了普定县，照道理县委应该好好地招待我们。你想想，南大来了六个专家，又是专程来帮助他们解决重要问题的，当然应该好好招待啦。但是他们招待不起，他们没有东西。我们在那里总共住了十天，野外工作一个星期，每天只能吃到两顿饭，最好的菜就是猪肉炖粉条。后来我们临走的时候，他们才告诉我们实话，因为我们是外面来的客人，是国家派来的专家，所以县委特地派人到二十公里外的一个部队农场拉了一些粉丝和几斤猪肉来招待我们，要不然就没有东西给我们吃。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它有力说明当时中国不是应该批判什么“唯

生产力论”，而是应该大力发展生产力。所以我就觉得当时中央所推行的那一套极“左”的东西跟下面的实际情况根本不符合。

野外工作一星期，我完成了普定县地层划分工作，下面的工作由地理系的同事去做，我就独自乘火车回来了。这趟火车是由昆明开往上海的，火车上供应的伙食比来的时候更差，盒饭里的菜就是腌菜，连一点肉丝也看不见。这又引发了我的感慨。当时火车在我们中国是实行半军事化管理的单位，是我们国家的对外窗口，是我们国家的脸面，连火车上的饭食都供应不好，可见当时国家困难到什么程度了。如果有办法的话，它愿意这样子给国家丢脸吗？这就又一次验证了批“唯生产力论”是完全错误的。而且我从昆明坐火车到上海，沿途经过许多省份，物质生活条件都很差。由此可见当时物质的匮乏不是一个县、一个单位的问题，而是全局性的问题，至少是一个大区域性的问题。因此我当时就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现在不是要批所谓“唯生产力论”，而是应该大力发展生产。否则这样下去的话“民饥必反”，到那个时候就不要怪老百姓不要共产党了。你共产党应该充分的检讨和反省自己，为什么会到今天这个地步？这是我当时的想法。不过另一方面，我又觉得这个跟我个人没有直接关系，我人微言轻，也没地方提意见，所以这些想法只能闷在心里。我只要做好本职工作就可以啦。

从贵州回来以后，我又接受了系里给我的新任务，参加“宁—芜火山岩盆地铁矿资源研究”项目，就是在南京至芜湖之间的火山岩盆地找铁矿。其实我的任务不是直接去找铁矿，而是带领学生们结合毕业论文做地层基础研究工作，把这个地区地层的层序搞清楚。我是这个研究项目的领队，也是学生们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我3月11或12号才从贵州回到南京，到15号又走了，到安徽安庆、庐江等地收集材料，了解情况，到了3月20号我回到南京。我对这个时间记得特别清楚，是因为3月18号安徽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从安庆回来以后我就开始制定工作计划。这样就搞到3月底了。

到了3月29号，南大南园的大标语、大字报出来了。我记得比较清楚的大标语有两条：一条是“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另一条是“无数革命先烈和革命老前辈用鲜血打下的红色江山我们也要用鲜血来保卫”。后来知道这是李西宁、秦峰他们张贴的。

我当时住在校外，住在水西门附近，我们地质系的办公室在北园的东南大楼

里，所以每天下班回家的时候我都要经过南园，这样就看到南园的这些大标语、大字报了。我当时打心里拥护，觉得他们说得有道理。因为现在中国不是应该批所谓“唯生产力论”，而是应该把发动批“唯生产力论”的那些人搞掉。大标语说“打倒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我们心里都很清楚就是指的张春桥、姚文元、江青他们这帮人。很明显，他们就是我们国家现代化建设道路上的一个绊脚石，不搞掉他们中国就不得安宁。我觉得安徽的现实、贵州的现实，至少能够证实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现在不是批所谓“唯生产力”的问题。邓小平等人的主张是对的，当前中央的那些极“左”的方针政策是不对的。但是我当时并不准备参与什么具体行动，我还是打算带领学生出去实习。我觉得我们每个人把自己的分内工作做好，就等于间接地抵制“四人帮”的极“左”政策，支持拥护邓小平的正确路线。

导致我后来被捕的由头，是3月30号晚上我在新街口的一次偶然的谈话。那天我在办公室工作到很晚，大概到晚上七、八点钟的时候才回家。与前几天一样，我还是先在南园里逗留了一会，看过大字报以后才回家的。从南园广州路大门出去一直到新街口，一路上都是大字报、大标语，看大字报的人也很多，到处都是乱哄哄的。这样就没有办法骑自行车啦，于是我就下来推着车子走。走到新街口的时候，我看见新街口西南角有一个解放军正在与另一个人站在那里谈话。后来我才知道那个解放军是南京部队某部的一个副参谋长，而那个和他在一起的人是江苏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我当时很想听听解放军同志是怎么讲的，就凑了上去。结果那个解放军没有怎么讲话，倒是那个广播电台的记者在那里滔滔不绝地讲，讲了一大堆我闻所未闻的情况。不过我从这些情况中得出的概念，与我此前在贵州和安徽等地的见闻和感想完全一致。后来我憋不住了，就插进去说：“他们现在批‘唯生产力论’，依我看是完全错误的。现在不适宜批“唯生产力论”，而是要大力发展生产。”

接着我就把我在贵州、安徽见到的情况讲了。为了加强说服力，我还引用了一些马列主义的经典论断。我说我们现在喊的口号是“奔向共产主义”，其实大家对“共产主义”的概念还没有搞清楚。什么是“共产主义”啊？马克思、恩格斯老早就定义好了，他们说“共产主义是物质财富大量的涌流”。什么叫“涌流”啊？涌流不是小溪小河，而是像长江一样，滚滚而来，滔滔不绝！只有物质财富达到那种程度了，那才叫共产主义。我们现在的物质财富如何呢？还有列宁讲过，

“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电气化”是什么？“电气化”就说明那个社会已经很发达了，能源很多了，工农业生产都用上机器了。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不是这样的？我还说连赫鲁晓夫都晓得“共产主义是土豆烧牛肉”，我们现在天天有土豆烧牛肉吃吗？我们到贵州普定县搞科研，堂堂县委招待不起我们几个人，最后还是从几十里外的部队农场里拿了几斤肉、几斤粉丝来招待我们的。还土豆烧牛肉呢？根本就没有！我还说毛主席号召我们“抓革命，促生产”，我们现在是只抓革命，不促生产。邓小平抓整顿，抓生产发展，本来是对的，却被扣上什么“唯生产力论”的大帽子。我看啊，再这样批下去就要亡国了！老百姓要闹饥荒了！实际上已经闹饥荒了。

我大概就是这样讲的。那个时候完全没有准备，更没有讲稿，纯粹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性质。不过我讲的这些话也不是凭空瞎讲，也不是跟着人家去瞎起哄，而是带有我个人的独立思考。就是把我所见所闻的事实和经典作家的那些论述糅合在一起。这样一来就比较深刻、比较有说服力了。我大概讲了一二十分钟，讲完以后我说：“我就讲这些。我要回家去了。”我感觉肚子饿了。

这时我们周围已经聚集了一大圈子人，我讲完正要离开，有人高声喊：“请你再讲一遍，我来晚了，没有听到前面的内容！”还有人喊：“我们站得远，没有听清楚，请你再讲一遍！”我说：“我要回家了，我还没有吃饭呢。”但是大家不让我走，坚持要求我再讲一讲。那个解放军就对我说：“既然大家这样强烈要求，那你就再讲一讲吧。”这样，我就又概要地讲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怎么讲的，毛主席怎么讲的，现在怎么做的，我在外地出差都看到了什么，然后我说：“照我看来，现在工人就应该坚守岗位，把生产搞上去，农民就要种好田，学生就要上好课，教师就要教好书。我们还是要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不然的话光搞革命，生产搞不上去，我们大家吃什么？”讲完以后群众都鼓掌，说：“好！你讲的太好了！”

这时候聚集的人更多了，有人又喊：“我们没有听到，请你再讲一遍。”我说：“我已经讲过两遍了。”他们说：“我们刚来，没有听到你的观点。”后来那个解放军说：“你再讲一遍吧。”我实在是感到盛情难却，就说：“这样子，我再讲一遍，不过这是最后一遍。我明天还有事，讲完大家就让我走，行不行？”大家都回答：“行——！”于是我就又讲了一遍。这第三遍就更简单了，就把几个论点、

几个结论简单复述了一遍。最后我说：“我现在应该回去了。”群众说：“好！我们欢送！”大家一面热烈鼓掌，一面自觉让开了一条通道，欢送我离开。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人民群众的观点是高度一致的。如果这个时候听众中有两派的话，那肯定就打起来了，那我就肯定要被人揍苦了。但是没有。高度的一致！而我自己呢？按照我当时的想法，我讲的话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完全没有错误的地方。所以我回家后很坦然，觉得自己做了一次正确的勇敢的行动，有一种从来没有的说不出的痛快。吃了饭，夜深人静，我的心情依然很兴奋，又画了一幅画才睡觉。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个讲话会引来杀身之祸。

不久，南京发生的群众性抗议示威活动被定性为“南京事件”。我开始担心自己会被牵连进去，心中隐约感到有些不安。但是我当时还怀着一丝侥幸心理，认为我在外面发表讲话，离学校远远的，也没有碰到什么熟人，别人又都不认识我，不要说我的讲话没有问题，就是有什么问题也揪不到我。哪里想到，我身上当时挂着南大校徽呢。

实际上我讲话以后，第二天就有人到南大党委去告密，说康育义在新街口发表反动演说。后来又说这个“南京事件”是什么“反革命事件”。哎呀！这下子不好了！不过当时担心也没有什么用，我还是等着带学生去野外考察研究。后来系里通知我不要出去了，又没有跟我讲什么理由，我就知道这个事情有点不妙了。不过这个事情我一直没有告诉我爱人，所以家里的人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

大概到了4月21日，学校派人到我家里来，通知我下午到学校去一下。我当时不在家，后来是我爱人转告我的。我一听就知道凶多吉少。下午我骑着自行车到了学校，当时通知我到斗鸡闸（注：南大校园内一座小办公楼），进去之后还没有讲两句话，从外面进来两个陌生人。

他们对我说：“你是康育义吗？”

我说：“没错。”

他们说：“你被拘留了。”

二话没说，就上来给我戴上了手铐。

我想这下坏了，事情弄大了！问题严重了！不过我当时还比较镇定，就跟学校里在场的同志交代，保管好我的自行车，通知我的家人，然后就跟他们上了吉普车，车子一直开到娃娃桥看守所。

我进去以后不出半个小时，马上就提审。那个提审员，后来我才知道是省公安厅的一个处长，姓丁。还有一个书记员，也是省公安厅的。

那个姓丁的提审员进来以后表情很严肃，问我：“你是康育义吗？”

我说：“是”，

“哪个单位的？”

“南京大学的。”

“干什么的？”

“教师。”

“你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不知道。”

“你在新街口发表反动演说！现在把你演说的事给我们讲一遍。”

“你凭什么认定我在新街口发表反动演说啊？”

“你就是发表反动演说了！”

“我那都是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述，联系我们的生活实际，谈一些个人的学习心得体会，你认为那是反动演说，这合适吗？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你信不信马克思主义？如果你信，你就不能说我发表反动演说。”

“你少啰嗦！就把你在新街口的事情讲一下。”

我觉得自己并不理亏，所以我就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讲完以后，那个记录员说：“你再重复一遍。”他要看你讲的有没有矛盾，有没有说假话。

我又重复了一遍，他也记下来了。然后他说：“请你再讲一遍。”

我有点不高兴了，冷冷地说：“我就这些东西，你说我反动也好，不反动也好，就是这些东西，没有加油添醋，也没有自我掩饰，我就是用马克思主义衡量目前中国的情况。”

审我的人也很有水平，他一看我也不像是小鱼小虾，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就说：“今天就到这里。你回牢房去吧！”

我以为这就结束了，哪知道他接着说：“你回去以后，把今天所说的情况写下来。”

后来监狱长送来了几张空白的“亲笔供词”，还有笔和墨水。我对他说：“今

天我不写了，我该歇歇了，我够紧张的了。”

第二天我把这个材料写好交上去。他们看过以后，下午又提审。

那个提审员说：“你能不能把新街口的讲话再重复一遍？”

我一听就有点火了：“又叫我重复？我不是都写好了吗？”

他听了我的回答，调整了一下语气，对我说：“请你再讲一遍。”

于是我就又讲了一遍。

他们又做了记录。完了以后他们把这个审讯记录拿给我看，让我看完之后签字。我看得很认真，不敢马虎，他写得不对的地方，他写得不清楚的地方，我就把它划掉重写。确认记录中没有错误和遗漏以后，我才在上面签字。

第二天也是这样。我意识到这是一场政治斗争，我的性命全系在这个记录上，如果稀里糊涂签了字，那是要倒霉的，所以还是看得很认真，仔细核对这个记录里的每一句话是不是我讲的，如果不是我讲的，是他自己猜测的，或者是他故意歪曲的，那就统统划掉重写。

连续提审了一个星期，天天如此。

一个星期以后，有关新街口演讲的所有细节搞清楚了，他们就开始问一些别的问题。是一个专题、一个专题地问。比如有一个专题就问我幕后策划者是不是章德（当时的南大党委副书记）？他们还采用各种方式“启发”我。我说我的演讲完全是偶然的，没有人指使我。我在新街口看到了那个情况，就发表了 my 见解，我到现在都是这样认为的，现在就是不能批“唯生产力论”。不要说是一个堂堂的南京大学教师，就是一个普通人学过一点马克思主义著作，讲这几句话也不需要哪个人来指使，那都是明摆着的事情。

他们没有办法，就转到江苏国画院的画家亚明身上。因为我爱好画画，所以跟画家亚明关系比较好。当时文艺系统正在揪亚明的什么问题。

他问：“你认识亚明吗？”

我说：“认识。”

他问：“你们怎么认识的？”

我说：“那还是在 1966 年夏天，文艺系统在美术馆搞了一个‘黑画展览’，把亚明、李进、周村三个人打成南京的‘三家村’。我认为那些人不是‘黑帮’，他们的画也不是‘黑画’，他们有他们个人的生活兴趣，比如亚明收集了很多砚

台、茶壶，他们的个人生活内容非常丰富，我对他们很敬仰，希望有机会与他们交往，后来经过其他人介绍就与亚明认识了。我和亚明在一起时只向他请教画画的事情，从来不谈政治。”

他追问几次，我不耐烦了，严厉地对他说：“请你不要再追问了，再追问就是逼供信！”

他们发现我这个人性格很犟，就没有再追问了。

我想想新街口演讲也讲过了，交待也交待了，就由你们去评判吧。如果你们还相信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那你就承认我这个演讲不是反动演说，我这个人也不是反革命。如果你们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了，那只能说明你们已经背叛了，那我就更有理了。这样一想，我自己心里倒非常安稳了，不像刚进来的时候思想斗争十分激烈，一会儿考虑这个，一会儿考虑那个。我想顶多关几天，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了，我就可以回家去了。

可是半个月以后，有一天又把我拉出去了。那天下午一点多钟，看守所所长来了。他大概有五十来岁，面相很和善。他了解我的情况，但是爱莫能助。他不能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所以就通过其它方式来向我表示友善。

他就跟我讲：“今天让你到五台山去，他们要批判你。”停了停他又说：“你就让他们批判，你不要讲话。”

我说：“不讲话就不讲话啦。”

他说：“对不起，你还得戴手铐。”

我说：“戴吧。”

戴好了之后，他又问：“手铐紧不紧？”

我说：“不紧。”

看到我的裤带松了，裤子掉了一点，他又问我：“要不要把裤带扎紧一些？”

他只能用这些细节来表达对我的同情和支持。他不能明讲“你没事，你是好人！”否则就把他也牵涉进去了，你干吗同情一个“反革命分子”？！

到了五台山以后，一共六个人接受批斗。我是第六个。其他五个我都不认识，后来在报纸上才知道他们的名字，记得有徐同新、王运德等人。我还记得把我们几个依次押上台的时候，广播里就宣布“某某某，年龄、职业……共产党员……”每一次报到“共产党员”身份，下面就是一片哄闹、喝彩。当时我就有一种很奇

怪的感觉：从第一个到第五个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都是反革命！这个斗争会太滑稽了！就我一个例外，我不是共产党员。

另外一件事情也很滑稽。我被押上去以后，一看走过来做批判发言的是我教过的一个学生，是古生物班的。他也不知道怎么搞的，一上来慷慨激昂的，讲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鬼使神差地出了事，他的嗓子突然哑了，说不出话来了。停了大概有好长一段时间，再讲，声音还是不行，最后不得不草草收场。

可是就在他发言中断的那个时候，我的身体已经很差了，感觉到站不住了，要晕倒的样子。架着我的两个解放军感觉到了，其中一个就小声在我耳边说：“快了快了，再坚持一会。”你要知道这是在全市十五万人批斗“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大会现场啊！在这种场合下，我听到这个声音，这是解放军同志给予我的道义上的最大的支持！于是我就咬紧牙关，终于坚持下来了。

当时批判我的罪状之一，是在学校里提倡智育第一，反对德智体全面发展。其实我在学校的时候对学生们是这样讲的：“你们进来南大不容易，是同龄人当中的佼佼者，你们代表了同龄人来上大学，肩负着建设祖国的重任，所以要学好功课，将来建设国家。”我总是一门课从开始到结束都贯穿这种思想。怎么在这个时候却变成了罪状？老师叫学生学好功课，强调知识就是力量，何罪之有？在那个时期，要想把一个人打倒，那就罗织罪名、编造罪状，毫无道理可言！

这次批斗大会就这样收场了。回到看守所以后，我看到《新华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批判现行反革命分子大会”的消息。我说不好，已经定性了！如果“四人帮”上台，要杀人立威的话，我们这些人肯定是第一批。

那么怎么办呢？我必须证明我的说法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所以我赶快写了个条子，叫我家人把马克思、恩格斯的选集给我带来。结果很快就带来了，批斗会以后我就不要每天写交待了，就在那里等判决。这个时候我争分夺秒地读书，从第一本第一页第一行开始，一直读到最后。读书时要做笔记，但是当时没有纸和笔，因为不写交代材料了，监狱里就不给你纸笔、墨水了。怎么办呢？当时的牙膏皮都是用锡做成的，我就把牙膏皮弄干净卷成一个笔芯的样子，用这个“笔”在书上划，能留下道黑印子。我就这样读马、恩著作。

我以前只零星地读过《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这个时候我把四卷本的马恩选集都读了，而且读得非常认真。结果越读越有信心。读完以后我心里豁然

开朗，就像马克思说的那样，“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这是一句名言，我绝对相信这一点。当时如果要判我死刑，就会有一个上诉期，我就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自己辩护，这些辩护词会留在我的档案里，后人会为我翻案的。我相信即使他们强词夺理把我处死，可是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之后，终归会有人给我平反。人们会记住我康育义，他们会说这个人在某年某月为了我们祖国的发展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一点我非常坚信。

我这接下来的半年多的时间就是在干这个事情。

大约到了10月7、8号的傍晚，围墙外突然传来阵阵口号声：

打倒“四人帮”！

打倒王洪文！

打倒张春桥！

打倒江青！

打倒姚文元！

当时我以为听错了，靠着窗子再听，果然不错。

这个时候我就喊：“我们胜利了——！”

隔壁的人也喊，整个监狱都在喊：“我们胜利了——!!!”

监狱里的看守很恐慌，他跑过来喝道：“你们喊什么？！”

我说：“打倒‘四人帮’你不高兴吗？”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之后，姓丁的提审官来了，可能监狱方面跟公安厅报告这些人骚动了。

他来了以后，我就说：“老丁，我听到外面在喊打倒‘四人帮’，有没有这事？”

他回答：“有这事！”

我说：“那好。请你马上给我传达中央文件，为我平反，马上放我出去！”

他说：“现在还不能放你出去。你们进来的时候有一个手续，出去还得有一个手续。你再耐心等两天。”

我说：“那你要尽快！”

停了一会儿，我说：“老丁，有烟吗？我要抽烟！”

老丁会意地点点头，从口袋里拿出“大前门”香烟，递过一支给我，又亲自打火给我点烟。大概由于太激动、太兴奋，第一口猛抽给呛着了，我一阵猛烈的

咳嗽。老丁和记录员带着微笑看我的洋相。

随后我与老丁简单地交谈了一会儿，我强烈呼吁尽快释放我们这批受冤入狱的同志。老丁答应立即向上反映。我带着从未有的兴奋回到牢房，同监的人都簇拥在我的周围，以敬佩的心情热烈向我道喜和致意。

当时我们这个牢房里一共有二十多个人，睡的是大通铺，实际上是一块用木板铺垫的大平台。我进来的时候，就指定我睡第二号铺位，我不再被叫姓名，取代之以 5380 这个号码。我是这间牢房里唯一的政治犯，其他都是些小偷、流氓、刑事犯。后来他们给我讲，上面曾经要他们来监视我。那个睡第一号的犯人是这个号房的组长，他对我说：“5380 你是个好人，现在你们胜利了，我可以告诉你，你没有进来时，这个位子就已经空出来了，所长给我交待任务，每天要写报告，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写成报告。这几个月下来我得出一个结论，你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

他这么一说我才明白，原来我就感到挺奇怪，他怎么一天到晚在写什么东西啊？我是一个政治犯，写交待材料写了一两个星期也就写完了，你一个刑事犯怎么有那么多的事可交待的，天天在那里写什么东西呢？现在才知道他这是奉命监视我的行动。叫一个流氓、刑事犯监视一个大学教师、政治犯，你说奇怪不奇怪？

这个时候是我最开心的时候。我想我没事了，我就等着出狱了。我叫看守给我拿来笔和纸，就开始画画了。我要搞一些画稿带回去，要不然时间都浪费掉了。我也学着写写诗，其实我不会写诗。这一呆又呆了好长时间。

一直到了 12 月 8 号，提审员把我喊出去，向我宣布：“你纯属反对‘四人帮’，无罪释放。你回去吧。”

出来一看，南大有车子来接我。不是小汽车，而是一辆大客车，一辆四十座的大客车！弄这么大的一个车来接我，车上只有一个保卫处的人陪着，还有一个司机，总共三个人，这显得太不相称了！进校门时也没有看到欢迎的人群，也没放鞭炮。南京大学这个样子对我，我有一点愤慨：这些人怎么这样处理这个事情呢？至少南京大学应该派个小汽车把我接回来，再弄些鞭炮放放，弄些锣鼓敲一下子嘛。就这么偷偷摸摸地把我弄回来了，显然是没有把我当成真正的同志来看待，还把我当做罪犯嘛！而且回来以后，一个领导还教训我说：“你呢，回来以后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要再去闯祸了！”我不顾个人安危与“四人帮”做斗争，

怎么在他们眼里就变成“闯祸”了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才知道，当时中央和省里有规定，对我们这些人还要防范，还要监视。

我感到了一种可怕的冷漠。但我不在乎这些，我心宽得很，该干什么干什么。从 1976 年 12 月到 1977 年 5 月份休息了四五个月，我的身体复原了许多，就又带着学生到苏北油田搞基础研究去了。从这以后我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了。我感到自己已经损失很多时间了，现在时间对我来说是第一位的，我争取了时间就是抓住了生命中最本质的东西，也不去想东想西了，也不去计较是不是给我平反了。只要我大难不死已经算是很高兴了。在 1978 年江苏省科技大会上，我参加的研究项目《苏北油田基础地质研究》获得了大会奖。从 1976 年到现在为止，我总共写了有十部书，其中有自己的专著，也有和别人合作的著作。另外还创作了上千幅山水艺术作品。

尤其让我感到兴奋的是，1965 年我生病的时候，师从一位画家学习山水画，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立志要把山水画和地质学结合起来。在我后来创作的时候始终坚持这一想法。从 1985 年开始，我把主要精力投入各地旅游资源开发工作，先后赴贵州黄果树地区、新疆特克斯县、福建永春县等地进行考察研究，开辟了山水画直接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道路，开创了“山水地质学”。到了 1997 年的时候，“山水地质学”正式在南大开课。2003 年 3 月，这门课的讲义《山水地质学与中国绘画》印出来了。后来经过修改，于 2005 年 2 月份由江苏美术出版社正式出版，成就了一门新学科。《新华日报》、《扬子晚报》、江苏新闻网都及时报道“山水地质学”在南大诞生的消息，南大校刊还专门开辟整版报道“山水地质学”首发座谈会的新闻和专家评论。我来南大整整半个世纪，从未见过南大校刊用整版篇幅报道一本书的出版。这表明学校对此极为重视。

董国强：您多次提到您自己出身不好，您是什么出身？

康育义：在 1951 年土改的时候，我家的成分被定为地主。现在看来当时的定性是错误的。

我的家在福建省永春县西部山区的农村，那个地方很穷的，富人并不多。我们家是五代祖传中医，当时家里有 12 口人，人均土地占有量低于当地的平均水平，所以土改时还分了一些土地进来。不过我们祖宗在外乡购置了一些田产，规定哪家的小孩子今后有出息，到外面去读书了，费用就由这份田产的地租中开支。

这在当时叫“学租”。我们家有两份学租。但这部分土地的数量也不多。所以土改的时候一开始给我家定的是“富农”。后来怎么会又划成“地主”了呢？那都是土改运动中的指标摊派给害的。因为我们那个地方很穷，按照规定划出来的地主家庭很少，后来一看全村的地主加起来不够数，完不成上级摊派的指标名额，于是就从那些“富农”中间又提拔了一批“地主”。我们家就属于后来提拔上来的“地主”。

另外我的父亲和我的叔叔解放前都是小学教师，我父亲去世得早，我的叔叔后来还担任过小学校长。按照毛主席的“阶级分析”观点，小学教师和小学校长都应该算是“自由职业者”，至多可以算作“小资产阶级”。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不是那样来的。那么就因为我的叔叔解放前当过小学校长，于是从解放初的 1951 年开始，他一直被作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受到管制。我们家被补划为“地主”跟这个事情也有一些关系。

在那个时代，你的家庭一旦被定为“地主”，那就得背一辈子黑锅。

董国强：那么您的出身对您的个人成长有怎样的影响？

康育义：还好。我从初中到高中，学校里还没有因为我出身不好而看不起我，相反我的老师们都因为我学习成绩好很器重我。比如说 1951 年我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正碰上土改，家里的房子、粮食都被分掉了，全家 12 口人挤在 4 间房间里，生活很困难，没有饭吃，这种情况怎么读书啊？所以到初二下的时候我就辍学了。新学期开学以后，我们的王校长就问我的同学：“康育义怎么没有来上学啊？”我的同学回答说：“他家没钱。”我那个时候上的还是一所私立学校，是要交学费的。哪知道王校长听了很大度地说：“你叫他先来上学，没有钱再说。”这样辍学又复学，就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王校长听说我家里被评为地主，他并没有害怕，也没有和我划清界限，而是让同学把我叫回来继续上学。我回来以后学校还给我减免学费，就不要交钱了，只要自己管吃饭就可以了。所以后来每个星期我都要回家挑米交给学校食堂，菜嘛就是自己带一个星期的咸菜。到了高中的时候有助学金了，学校给了我一个丙级助学金，还有吃饭的补助金，这样我的中学学业终于维持下来了。不过那时生活仍然很艰苦，整个中学时期我一直营养不良，高中毕业的时候身高才 1.55 米。

梅雪盈：1978 年 11 月 15 日中央宣布“南京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然后在 12

月2日南京大学开了一个平反大会，您能不能谈谈当时情况？

康育义：当时我不在南京，正在苏北油田参加学术会议，在会上报告我的研究成果。有人从广播中听到了南京大学召开大会，**为李西宁、秦峰、康育义等**三位同志平反。那样一广播出来，我当时就变成了明星了，大家都向我祝贺。我坦然一笑，也没有表现得很高兴。到后来授予我们“英雄战士”称号的时候，我参加了。颁发给我一个奖状：**授予康育义同志同“四人帮”作斗争的英雄战士光荣称号。**

这个奖状对于我个人的意义在于：有了这个奖状之后，人家就不会再把我看作“反革命”了，我也可以专心搞学术了。

梅雪盈：在1976年到1978年间，学校里有没有人说您是“反革命”？

康育义：至少没有人公开讲，南京大学师生对于这个事情大概看法比较一致，认为我们代表南大，我们给南京大学争得了荣誉。

梅雪盈：毛主席过世以后，您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

康育义：那是通过看报纸知道的。我们在监狱里可以看到《新华日报》，从中我们知道一些外面的情况，包括朱总司令逝世和唐山大地震。当时得知唐山大地震以后，我还想过，我作为地质学家应该去现场考察考察，但是我们不能出去，所以当时很难过。

听到毛主席去世的消息，当时我们也很难过。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觉得历史有时真的很促狭，如果毛主席当时不死的话，我们就死了。换句话说，有毛主席就没有我们，没有毛主席就有我们。我们的命运注定了要跟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不过当时不是这样看的，当时听到说毛泽东死了，我们就很紧张，感到我们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了。

董国强：当时您认为毛主席死了，形势对你们来讲更严峻？

康育义：更严峻。因为“四人帮”可能上台掌权，那么为了稳定政局，他们肯定要杀一批人来树立威信，而我们这些人肯定是最先被拉出去砍头的。

梅雪盈：南大的老师们对“南京事件”有什么反映？

康育义：那个时候人人自危，敢怒不敢言。大家知道康育义没有问题，但是也不能为康育义辩护。只能是跟你离得远点，跟你划清界限，免得引火烧身。但是内心里面是不服气的。不过有一些人也不可捉摸。例如说我在新街口“发表反动

演说”的告密者也是我们地质系的老师。

【文摘】

探寻“三国四方”会议真相

史 学

搞清“三国四方”会议真相的三大要点

关于林彪事件中的“三国四方”会议，今天的人们，大都渐渐淡忘了。但是当年，官方把它作为林彪反党集团“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地进行反革命政变准备工作的重要证据之一，进行过浓墨重彩的渲染。

中共中央，在 1972 年 6 月 26 日《中发〔72〕24 号》文（材料之三）中对此是这样描述的：林立果“3 月下旬，按照林彪的旨意，炮制了《‘571 工程’纪要》。3 月底，林立果在上海召集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开了一个所谓‘三国四方’会议。这次会议，对执行《‘571 工程’纪要》的反革命政变计划，作了组织上的准备和分工。这次会议，程洪珍在日记上作了记载。江指江腾蛟、王指王维国、陈指陈励耘、周指周建平。”

在该文第 41 页，有一不起眼的注解，“程洪珍的亲笔日记，是在林立果在北京的秘密据点中缴获的。”

1980 年 9 月 29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关于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起诉书》中对此是这样描述的：“1971 年 3 月 31 日，林立果根据《‘571 工程’纪要》建立‘指挥班子’的计划，在上海召集江腾蛟、王维国、空五军政治委员陈励耘和南京部队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秘密开会，指定南京以周建平为‘头’，上海以王维国为‘头’，杭州以陈励耘为‘头’，江腾蛟‘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

要搞清“三国四方”会议的真相，有三个要点。

第一，此会是不是“林立果根据《‘571 工程’纪要》建立‘指挥班子’的计划”，在上海召开的？

第二，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知不知道《“571 工程”纪要》？此会是否讨论过“武装政变”问题？

第三，所谓的“南京以周建平为‘头’，上海以王维国为‘头’，杭州以陈励耘为‘头’，江腾蛟‘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是不是武装政变的“指挥班子”？是不是为“执行《‘571 工程’纪要》的反革命政变计划，作了组织上的准备和分工”？

如果这三个关键点，法庭不能当庭坐实，检察院关于“三国四方”会议是为建立“指挥班子”而召开的指控，就是子虚乌有。

然而，1980 年 11 月 25 日下午，法庭对江腾蛟的审问（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第 105 页～112 页），根本没有围绕上述三个关键问题展开。

第一，关于第一个问题。庭长黄火青问江腾蛟，“刚才讲的‘三国四方’会议，是在《‘571 工程’纪要》制定以后召开的，而且李伟信交代里头有个形势分析，你这个讲话，参加了‘三国四方’会议就是分配了一下谁管啥、谁管啥，没有说是不是跟这个形势有什么结合，到底跟这个形势有什么结合没有？”江腾蛟当即否定：“《‘571 工程’纪要》我不知道，我一直不知道”。接下来，应该由检方当庭拿出可以证明“三国四方”会议确实是“林立果根据《‘571 工程’纪要》建立‘指挥班子’的计划”而召开的证据。但是，这个问题被审判员任成宏“回避”掉了。

第二，事实已经证明，当时，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他们都不知道《“571 工程”纪要》。但是，庭审中，没有对此进行查证和说明。法庭也没有出示他们是怎样具体讨论“武装政变”问题的经过和情节。

第三，法庭没有拿出所谓的“三点的头”，和“指挥班子”是一回事的证据。

相反，那个“指挥班子”中，有的是“江、王、陈”，却没有周建平。

从黄火青上述问话中，可以看出，检方的认定逻辑是：因为（1）“三国四方”会议是在《‘571 工程’纪要》制定以后召开的，（2）《‘571 工程’纪要》里头有个“形势分析”，（3）《‘571 工程’纪要》里头有个“指挥班子”，所以，只要“三国四方”会议中，分析了形势，分配过任务，就可以认定，该会议是“林立果根据《‘571 工程’纪要》建立‘指挥班子’的计划”在上海召开，而完全不必顾及有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和它们之间的区别。

显然，检方的逻辑是不严密的。只要会议中关于形势的分析，与“纪要”中的分析不同，只要会议中的“分工”，与“指挥班子”不同，那么，即使会议是在“纪要”制定之后召开的，也不能断定会议与《“571 工程”纪要》有着必然的联系。

为了搞清“三国四方”会议的真相，多年来，笔者走访了当事人和知情人。得出的结论是：“三国四方”会议只不过是为解决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之间的团结问题，进行的一次谈话。与反革命政变，风马牛不相及。

“三国四方”会议的真实背景

“三国四方”会议是在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之间的关系已到了剑拔弩张的背景下召开的。首先，我们介绍一下以上四位的简历。

江腾蛟是红四方面军的“红小鬼”。1955 年授衔少将。1957 年任上海空四军政委。1964 年调任南京空军政委。1968 年文革中，在南京，因反对许世友，被林彪、吴法宪调到北京，任空军政治部党委书记，保护起来。

周建平 1957 年调任上海空四军参谋长，后任空四军军长，1969 年调任南京空军副司令员，南空党委副书记。少将衔。周在空四军工作长达 12 年。1967 年 9 月，在文革动乱高潮中，周负责指挥空四军、空五军部队，一举击落美蒋 U-2 飞机一架。所属部队“为人民立了新功”。

王维国曾任空四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后调空五军任副政委。文革初，调空四军任政委，书记，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南空党委委员。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大校衔。

陈励耘时任空五军政委，书记，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南空党委委员。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大校衔。

其次，我们从与会者的关系入手，介绍一下会议的背景。

谈到江、王、陈、周之间的紧张关系，主要是指江腾蛟、王维国，以及南空机关“左派”与周建平之间的矛盾和王维国与陈励耘之间的矛盾。这一点，当时在空四军和空五军内，是公开的秘密。

文革期间，由于军委空军“两条路线斗争”的影响，特别是 1968 年的“杨、余、傅”事件，南空机关原已存在的激烈的派性斗争，使得机关工作走到了崩溃

的边缘。为此，毛主席亲自签发了改组南空领导班子的命令：将聂凤智、江腾蛟调离南空。任命刘懋功为司令员，于应龙为副政委。但是由于林彪集团的直接干扰，南空机关的派性斗争，非但没有缓和，反而日趋恶化。刘、于首长几乎到了无所适从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军委空军再次采取组织措施。周建平就是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由空四军调往南空任副司令员、党委副书记的。

周建平到南空以后，一方面，南空机关“左派”根本不听招呼。以政治部主任胡立信、副参谋长牛润五为首的机关“左派”，自持有林立果、江腾蛟为后台，攻击周建平“与刘、于靠得紧”，不支持“左派”。胡立信说：“我与他（周），在路线上有很大分歧，今后要同他斗争到底。”江腾蛟伙同牛润五，给林立果写信，告周的状。说“周是假‘左派’，真‘右派’，不可信任”。对这封告状信，林立果批示：“完全同意江政委和左派同志们的意见”。江腾蛟对“上海小组”成员说：与周“生活上可以来往，政治上只能分道扬镳了”。另一方面，于应龙也在背后说，周与我们貌合神离。于还在党委会上公开指责周支持机关“左派”，拆他们的台。周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在空四军方面，王维国为了消除周建平在空四军长期工作的影响，在上海巨鹿路专门举办机关处以上干部的骨干学习班，公开要求大家旗帜鲜明地和周建平划清界限。江腾蛟的秘书张发云，在会上逼迫与会者揭发周的问题，与周划清界限。王维国对军党委的同志说：“周就是把林副部长当小孩子看待（指周不尊重林立果）”。军长郑长华说：“周手伸得太长，谁反对林副部长都不答应”。王维国的老婆等人，则利用下部队宣讲“路线斗争”的机会，攻击周“到南京后就变了，与刘、于靠得很紧，许世友还请他吃饭、喝酒”等等。在空五军方面，陈励耘则以空五军党委的名义，给南空和空军党委正式发电报：要周作出检讨。

因此，周建平在南空机关的处境，十分困难。周不得不直接向空军党委表示：要求查清事实，作出组织结论，否则，无法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周建平被迫在1970年夏，到上海空军第三医院住院，治疗耳疾。时间长达数月之久。与此同时，南空机关派性斗争，还由于陈励耘正通过胡立信；王维国通过牛润五的插手，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陈励耘与王维国的矛盾，起自“十支白蛋白”的风波。陈励耘老婆曾向上海空军455医院领导要十支白蛋白。但是，陈励耘派人去取时，被王维国婉言推拒

了。陈励耘对此极为不满。以王维国对他照顾不周为由，在空五军，对王维国大兴“亲不亲，线上分”的讨伐。有一次，空四军党办秘书处处长裘著显和保卫处副处长唐剑鸣到杭州时，陈励耘在刘庄接见了他们，说：“你们回去对王维国讲：他拉拢南萍搞我，是不会有结果的。你们就这么转告他！”有些事，在现在看来，似乎是“鸡毛蒜皮”的问题，但在路线斗争的弦绷得很紧的1971年，就成了“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了！

由此可见，“三国四方”会议之前，周建平与江、王、之间，王与陈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到了“分道扬镳”的地步。

林立果面对这样复杂的人际关系背景，怎么敢把这样“你死我活”、“矛盾重重”的四个人，拉倒一起，拼凑成政变的什么“指挥班子”呢？！怎么敢将“571”政变的“核心机密”，捅给他们呢？这不是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当儿戏吗？！

事实上，林立果只不过是把他们召集起来，解决一下他们相互之间的团结问题。这就是所谓“三国四方”会议的真相和实质！

关于这个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第110页是这样记述的，江腾蛟说，“19号下午，我到（林立果）那去，开始他并没有讲要开会，他说陈励耘和王维国的关系很紧张，他在杭州给陈励耘做了他应该做的工作，你现在到上海来养病，要趁这个机会也给他们做做工作，可不可以？我说可以。”程洪珍的笔记中，也有会议“团结气氛比较好”的记录。

其实，要搞清“三国四方会议”的真相，并不困难。在江、王、陈、周和所有相关工作人员的全部交代材料中，都异口同声地说：“那是个解决团结问题”的谈话。在空四军、空五军和南空机关的专案“学习班”里，有大量证据，印证了当时他们之间的“路线斗争”，有多么激烈。可是，历届专案组的人，和那个“正义的法庭”，对这些“堆积如山”的事实，都视而不见，一门心思地硬要把“三国四方会议”往“政变”上挂，结果，弄得牵强附会，漏洞百出，逻辑混乱，不堪一击。这是一起“疑罪从无”的典型冤案。

关于陈励耘的三大不实之词

陈励耘是林彪疑案中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时任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空五军政

委、党委书记，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军事检察院指控他参与“三国四方”会议，被指定为“政变指挥班子”的“杭州的头”。

陈励耘的三大主要问题是：

(1) 1972年1月10日中发〔72〕4号文件（所谓的“材料之二”）第2页上说：“三月二十日，周宇驰到上海。林立果召集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开会研究制定政变计划。林立果说：‘这个事与首长（指林彪）谈到，首长叫先搞个计划’。林立果、于新野、李伟信按照林彪的旨意和在杭州同陈励耘商量的框框，在1971年3月22日至24日写出了反革命政变纲领”。也就是说，陈励耘是“571工程纪要”重要的始作俑者之一。（笔者注：“材料之二”中，关于周宇驰3月20日到沪，参与了571纪要的制定工作的说法，与《审判纪实》第107页，江腾蛟关于周宇驰“大概是二十八或是二十九号到”上海的法庭证词，是矛盾的。法庭对两者的矛盾，没有进行必要的当庭查证。如果以法庭证词为准，周宇驰就没有参与制定571纪要的作案时间。）

(2) “材料之二”的第3页中，说到“三国四方会议”的内容时，有一句非常重要，但却是闪烁其词的话：“据陈励耘交待，这次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也就是说，陈励耘是“三国四方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的重要证人。

(3) 《审判纪实》第107页中说，“法庭宣读陈励耘1980年7月14日的供词：‘林（立果）说，庐山会议都是几个老总，指黄、吴、李、邱搞坏的，丘八斗不过秀才，现在军队的日子难过啊。接着，他阴险地说，没有暴露的不能再暴露了。林说，现在的斗争是争夺接班人的斗争，就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也就是说，会上还讨论了“争夺领导权”的问题。

人们对此提出质疑：既然“571工程纪要”是林立果根据与陈励耘谈话的“框框”写出来的，那么，陈一定知道“571工程纪要”的基本内容。为什么文件中不引用陈励耘有关“571”“框框”内容的详细证词？！既然陈励耘交代“三国四方”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那么，文件就应该引用陈励耘描述会上是如何讨论政变问题的详细情况。为什么文件将这个重要情节“省略”了？！既然陈励耘说，林立果在会上说过“现在的斗争是争夺接班人的斗争，就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的话，那么，就应该让其他与会的三个重要人证，当庭作出相同的证词。为

什么法庭没有对“争夺领导权”这一重要问题当庭查证？！

不言而喻，中央文件对陈励耘的以上三点指控，是非常要害的！它关系到“571 工程纪要”有没有一个“活证人”的问题，关系到陈本人是否知道“两谋”的问题，关系到“三国四方”会议的性质问题，关系到参与“三国四方”会议的其他人，是否知道“两谋”的问题。

但是，后来的“公开审判”，却令人匪夷所思地“绕过”了这三个实质问题，不去对这三个问题的细节进行当庭查证。这只能说明，事实上，文件和法庭对陈励耘的上述指控，查无实据！其他与会的人，没有一个作出与陈励耘相同的“交代”，陈励耘的话，只是一个得不到其他旁证支持的“孤证”。这只能说明，有关陈励耘的三点“耸人听闻”的指控，纯属不实之词！完全是逼、供、信的产物！事实是，陈励耘不知道“571 工程纪要”；“三国四方会议”既没有讨论“政变问题”，也没有讨论“争夺领导权”的问题！

对于陈励耘的这些交代，有关的专案人员，当时也“将信将疑”。《超级审判》第 224 页中，对此有这样一段描述：“陈励耘在‘9·13’之后，不知是为了表示自己同林彪一伙划清界限而争取立功，还是有意把案情弄复杂，或是其它原因，他交代过一段情况：‘自上海黑会后，我为给林彪政变做准备，积极建立机场武装营、扩建警卫部队，改装了伊尔—10 飞机等。’三月间，他向工作人员写材料说明这段是自己编造的内容。那些事都是根据上级战备命令，在上海黑会之前都搞了，与上海黑会无关系。”

根据上述事实，人们完全可以认定，陈励耘在“三国四方会议”等重大问题上，确实作了伪证！那么，陈励耘为什么会作伪证呢？！

陈励耘出狱后，笔者问他，文件中有一句“据陈励耘交待，这次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那又是怎么回事呢？他说：“我在里面关了那么久，没完没了。不这么说，那还有个头？！”

这种涉案当事人不能“客观地充分地”陈述案情的事件，比比皆是。周建平当年出庭作证前，准备了发言稿，其中主要是他到少科站后，关于南空党代会问题谈话的详细情况。但是，审讯人员蛮横地逼迫他把这一大段删掉，只让他承认“参加了会议”。显而易见，由于当时周建平不知道，江腾蛟已经当庭作出“有林立果，有我，有王维国、陈励耘，加起来有四个人”的供述，所以，审判员只

需周建平到庭承认“参加了会议”，而不让他详细陈述谈话内容。这样，就当庭做了个“圈套”，用周建平自己的话，把他推入政变班子的深渊。毋庸讳言，审判员不让周建平如实作证，是有所盘算的：江腾蛟在法庭上的供词，已经给黄火青造成会议只是“分配一下谁管啥，谁管啥”的印象，如果再让周建平出庭讲一大通南空党代会的事，岂不是偏离了法庭需要的政变会议主题吗？当然，这种人为制造假案的痕迹，是经不起事实检验的。每当周建平提出“指挥班子，江、王、陈”没有周的严正质疑时，当年的专案人员，只能陷入无法自圆其说的尴尬困境。

质疑程洪珍日记本的出处

纵观林案的证据结构，有一个重要特点：凡是关键的证据，往往不是出自当事人，而是出自一些“小人物”。检方提出的关于所谓“三国四方”会议内容和性质的证据，就不是出自在上海与会的当事人，而是出自远在北京的，没有参加会议的空军党办秘书程洪珍的“日记本”。

关于这个重要证据“日记本”的出处问题，我们不妨做一个考证。

1972年6月26日，中发（72）24号文件，即所谓的“材料之三”P41中，指出：程洪珍的“日记本”影印件原文说：三国四方“会议是成功的，达到预期效果。团结的气氛比较好，解决了对当前东南形势看法，认识。（1）主要矛盾在上海，在张、姚，统一了认识。（2）加速我们的准备。（3）组织上明确了三点，每点的头是上海——王，杭州——陈，南京——周，互相配合。江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没授予指挥权。”请注意，在该文件P41，有一个注解：“程洪珍的亲笔日记，是在林立果在北京的秘密据点中缴获的。”

人们可能还记得，在这个神奇的“林立果在北京的秘密据点”，曾“出土”过著名的《“571工程”纪要》。而且是经李伟信等三人，反复清理了据点内林立果的遗留物后，由一位普通工作人员王某某，在一片狼藉的灰烬中，“意外”地在桌子上找到了那本丝毫没有烧毁痕迹的《“571工程”纪要》。对此，我们曾提出过“李伟信等人走后，到老王发现《纪要》之间，有67个半小时的时间真空”的重要质疑。

现在，还是在这个神奇的“林立果在北京的秘密据点”，又“缴获”了联合舰队“小司令”程洪珍的日记本，这种无巧不成书的偶然，不能不令人疑窦丛生！

看来，林立果、李伟信，不仅没有烧掉“571 工程纪要”，而且，留下了程洪珍的“日记本”，以备后查！

必须指出的是，关于“‘571 工程纪要’是由王某某在秘密据点的一片狼藉的灰烬中找到的”说法，是在世人对文件中关于“‘571 工程纪要’是从秘密据点的保险柜中找到”的描述提出严重质疑的情况下，才“突然冒出来”，以正视听的。但是，人们在编造“老王秘密据点意外觅宝”的故事时，显然忘记了“材料之三”第 41 页，那条不起眼的注解。那么，人们不禁要问：“程洪珍的日记本”，又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从“秘密据点”的灰烬中“抢救”出来的呢？！

还有一个疑点，既然是“日记本”，就应该有日期。如果是“记事本”，就应该记明何人，何时来电。即使当时没有写明，程洪珍曾于 11 月 23 日为吴法宪案出庭作证，那么，为什么不让程洪珍就这些细节，当庭作证？

可见，如果不能合理地解释程洪珍的日记本，是什么人，什么时候，如何从“秘密据点”中缴获的问题，人们有理由怀疑，这个日记本是程洪珍被俘后伪造的。因为其中关于“东南形势看法”，与谈话当事人的证词完全不符。

这些重要证据，在出处的时间、地点、过程上的矛盾百出，是显而易见的。这主要是因为林案的调查过程，时间太长，造假太多，而且参与造假的，又不是一批人。这样，在一些重要细节上，出现“疏漏”，以致首尾不能相顾，前后不能呼应，难以自圆其说，也是在所难免的了！看来“说谎”也挺难。

结论：“三国四方” 会议与政变无关

（1）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三国四方”会议是 1971 年 3 月 31 日晚开始的。林立果企图实施反革命政变的时间，却是在 1971 年 9 月 8 日。也就是说，两者相隔将近半年之久。必须指出：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政变，最怕的就是“走漏风声”。因此，为了严守机密，只有在发动政变的前夕，才能向参加者公布组织者的决心。否则，必遭杀身之祸！这是进行军事政变的起码的常识，也是一条铁的戒律。

作为久经沙场，且亲身参加过堪称“军事政变”经典之作的“南昌起义”的林彪，怎么会愚蠢到不顾兵家大忌，叫林立果，在距 9·13 政变半年之前，到远离政变中心北京数千里之外的上海，把几个矛盾重重的人，搞在一起，大谈什么

反革命政变，还拼凑什么政变的“指挥班子”？！难道他就不懂“夜长梦多”，“日久生变”的道理吗？！事实上，这几个人，身边都有直通中央的“红色保密机”。难道林立果就不怕有一天，其中某个人，突然向毛主席去告密吗？此其疑点之一。

仅此一条，就足以排除“三国四方”会议与政变有关的嫌疑。遗憾的是，当年，我党那么多久经沙场的“老同志”和“法学专家”，竟然连这样一个常识性破绽，都看不出来。

（2）“材料之二”认定：“三国四方”会议是“按照《‘571 工程’纪要》的计划，在上海召开的”。这个“认定”的证据是什么呢？与会的直接当事人，没有一个人知道“571 工程纪要”。至今，他们之中也没有一个人作出过“三国四方”会议是“按照《‘571 工程’纪要》的计划召开的”的证词。连李伟信，这个“纪要”的“半个孤证”，也没有作出过这样的供述。在程洪珍的日记本中，也没有这种记载。因此，“材料之二”的“认定”，只是“推理”和“假设”，没有事实根据！此其疑点之二。

（3）“材料之二”指出，林立果按照林彪“先搞个计划”的“授意”，在 1971 年 3 月 22 日至 24 日，写出了“571 工程纪要”。也就是说，这个“纪要”的草案，是在“三国四方”会议前一个星期，才写好。至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林彪当时已经首肯了这个“纪要”的草案。试问，在没有林彪首肯的情况下，林立果怎么就能按照《‘571 工程’纪要》的草案，擅自在上海召开“三国四方”会议，组织实施，甚至作出了“组织上的准备和分工”，确定了政变的“指挥班子”？！此其疑点之三。

（4）关于开会的准确起始时间和结束时间。必须指出的是，专案和审查搞了十几年，所谓“三国四方”会议，究竟有哪些人参加？他们都是何时到场的？这些重要情节，至今没有说清楚。

1972 年“材料之一、之二、之三”中，虽然多次提到会议的时间问题，但都是采用“1971 年 3 月底”这样一种笼统的“口径”。直到 1982 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给陈励耘、周建平“免于起诉书”和军事法院给王维国、江腾蛟的“判决书”中，仍采用的是“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晚至四月一日晨”，这样一些时间概念相当模糊、宽泛的措词，使人感到其中有那么多“猫腻”！《审

判纪实》和《超级审判》中，对会议的准确结束时间，也没有点明。此其疑点之四。

在这个时间问题上，官方文件多次采用 1971 年 3 月 31 日“晚”和 4 月 1 日“晨”之类的含糊措辞，显然不是“一时疏忽”，而是刻意所为。关键的问题就是：周建平算不算“与会者”。根据周建平事后对笔者的口述，他是 4 月 1 日凌晨 3 点半被原空四军军务处处长蒋国璋接到少科站的。届时，会议已经结束。他在那里总共就待了 1 个来小时。在他与陈励耘、王维国、江腾蛟的谈话中从来没有涉及到“武装政变”，“指挥班子”之类的话题。而且在这段过程中，林立果基本不在场。为此，周建平曾多次向军检院申诉。

（5）“571 工程纪要”明确写着：“指挥班子：江、王、陈”（江是原南空政委江腾蛟，王是原空四军政委王维国，陈是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但是，不在“指挥班子”中的原南空副司令员周建平，竟也被“中央文件”圈定为“指挥班子”成员。根据墨迹未干的“571 工程纪要”，周建平既不是“指挥班子”成员，也不在大、小舰队的“骨干”名单之列，甚至还被排除在“571 工程纪要”规定的“保密范围”之外，林立果怎么会在未经林彪首肯的情况下，擅自扩大“指挥班子”的范围？究竟哪些人是“指挥班子”成员？此其疑点之五。

（6）法庭上，公诉人沈加良说：“这个会议是为落实《“571 工程”纪要》实施要点中，建立指挥班子江、王、陈这个计划召开的。是为林彪搞反革命武装政变作组织准备的。”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与会的所有当事人，都不知道“571 工程纪要”。那么，沈加良凭什么证据说明，会上所说的“三点的头”，就与“571 工程纪要”中的“指挥班子：江、王、陈”，是一回事呢？此其疑点之六。

会上明确了“三点的头”的说法，最早的出处是 1972 年 1 月 10 号的中发 4 号文件。即在“材料之二”第 5 页中，原空军党办秘书程洪珍日记本中的一句话。应该指出的是，程洪珍当时根本不在现场。他既不是与会者，也不是场外的工作人员。采信这样一个人的话，本身就不可取。但是，即使程洪珍，30 多年来也从来没有作出过“三点的头”，就是“571 工程纪要”中的“指挥班子”的证言。相反，他的日记本中，却明明白白地写着：“没授予指挥权”！

公诉人把“没授予指挥权”的“三点的头”，认定为“指挥班子”，他不感到牵强附会吗？！公诉人那种把“三点的头”说成和“指挥班子”是一回事的指控，

是缺乏事实证据的“武断”。

(7) 最具重要有意义的是，要搞清楚：“三国四方”会议上，他们究竟谈了哪些有关“两谋”的实质性内容？这是疑点之七。

“材料之二”，P3 中，有这么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据陈励耘交待：会上讨论了政变问题”。这才是问题的要害。人们不禁要问，与会的人，活着的有四位。为什么只有陈励耘一个人，作出这样的“交代”呢？而且怎么看不到陈对这个敏感问题的详细供述呢？

请注意，打倒“四人帮”后，在法庭审判的过程中，再也没有提到陈励耘交待的这一关键问题的细节。陈励耘出狱后，推翻了“会上讨论了政变问题”的“交待”。军检院在给陈的“免诉书”的犯罪事实部分，对于“会上讨论了政变问题”的重要情节，只字不提。仅作出“情节较轻”，“免于起诉”的决定。这说明法庭也放弃了“会上讨论了政变问题”的指控。江腾蛟、王维国、周建平在以后的一切场合中，对于“会上讨论了政变问题”的情节，都予以了明白无误的否认。

有充分证据证明，“会上讨论了政变问题”，不过是陈励耘在当年逼、供、信的环境下，所做的搪塞之词。

(8) 至于“三国四方”会议名称的由来，是疑点之八。这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三国四方”会议的名称，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连听都没听到过”。程洪珍的日记本上，也没有出现过“三国四方会议”的说法。据场外的工作人员说，“那不过是林立果吹牛时的一句戏言”。所以，后来为了避免“哗众取宠”之嫌，法院和检察院在正式法律文本中，也不再沿用文革时期杜撰出来的“三国四方会议”的说法了，而是改用“秘密会议”。

以上所列八条，只是关于“三国四方会议”众多疑点中的冰山一角。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呢？问题很简单。一方面，审判人员受制于中央文件框框的限制，以及“钦定判决”的压力，另一方面，审判人员又不能不看到“三国四方会议与政变无关”的事实。在政治权力与法律的天平上，审判人员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正义和公正，无可奈何地向权力倾斜了。这就是造成“三国四方会议”冤案和林彪疑案的真正原因。

摘自《史学解读林彪疑案》，原载博讯网。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小资料】

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名单

(原载 1968 年 1 月 27 日《二七公社报》)

省直各战线 (共二十名)

刘建勋	原省委第一书记	夏传寅	原省委办公厅工业组副组长
纪登奎	原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	刘中和	原水利厅干部
王庭栋	原省委委员	张海泉	原交通厅干部
王维群	原副省长	郜国荣	原黄委会干部
张耀东	原省委副秘书长	窦 征	原省外贸局干部
戴苏理	原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	李尚谦	省委保卫科警卫员
刘一凡	原省人委水利厅副厅长	顾长富	河南日报社印刷工人
张柏园	原副省长	唐岐山	郑州铁路局司机
董连池	原省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		
李增荣	原省人委煤炭工业厅长		

(暂缺政法、文艺战线各一名)

郑州市 (共十七名)

王黎之	原郑州市委第一书记	杨国雄	河医学生
陈文书	原郑州市委书记处书记	周启忠	粮院学生
申茂功	国棉六厂工人	范念民	农院学生
杨锡淼	十三所技术员	王传玉	郑大附中学生
龙一兵	砂轮厂工人	李树德	铁路司机学校学生
李福山	郑州印染厂工人	蔡松亭	郑州市郊委一般干部
徐吉安	郑纺机工人	王文翠	河南中医学院学生
孟庆怀	五〇三厂工人	于作龙	郑州工学院学生
党言川	郑大学生		

河造总 (共十二名)

张宗海	省建工局二处工人	许振中	郑州纺织机械厂工人
-----	----------	-----	-----------

曾 云 郑州热电厂工人
刘春林 郑州新华二厂工人
丁淑琴 （女）河南中医学院学生
范万生 郑州工学院学生

开封市（共十一名）

陈红兵 开封师院学生
申红玉 开封电厂工人
郭守仁 环境卫生管理处工人
马双喜 化建机具厂工人
皇甫振 玻璃厂工人

郭金华 郑大附中学生
杜银初 省人委机械厅干部
轩东森 省人委建工局干部

（暂缺三名）

刘全义 市委办公室干事
姬长水 开封二中学生
魏尚宜 黄河水利学校学生
芦贤扬 原开封市委书记处书记
段文德 师院学生

（暂缺一一名）

洛阳市（共九名）

王甲军 原省委工交政治部主任
唐振芳 拖拉机厂工人
刘兴杰 农机学院学生
张国劳 拖拉机厂工人
毕道芳 轴承厂工人

丁二羊 拖拉机研究所研究员
蓝伟权 玻璃厂工人
洪增颜 黄河冶炼厂工人

（暂缺农民一名）

开封地区（共六名）

张 申 原开封地委第一书记
张钦礼 原兰考县委副书记
魏兆芳 开封运输公司司机

刘烈江 密县苟堂大队支书
王在文 开封师院学生
赵俊杰 开封专区外贸局科员

洛阳地区（共四名）

关廷秀 原洛阳地委副书记
刘景伦 洛阳运输公司司机

史宏西 偃师高中学生
（暂缺农民一名）

新乡地区（共九名）

耿起昌 原新乡地委第一书记
黄宗万 新乡师院学生

王善玉 汲县医专学生
阎帮印 百泉农专学生

朱圣新 焦作矿院学生
张迎夏 七五五厂工人
李学英 焦作市电厂工人

吕书墨 新乡县七里营大队副支书
崔丙和 封丘县应举大队副支书

商丘地区（共四名）

张学清 原商丘地委第一书记
王幼民 商丘一高学生

王新荣 （女）睢县河集公社刘庄大
队农民

（暂缺工人一名）

许昌地区（共四名）

王廷太 原许昌专署专员
寇保洲 省汽车修配厂工人

文香兰 （女）鲁山县老庄公社副社
长

（暂缺学生一名）

安阳地区（共六名）

杨文贵 林县河顺公社东山大队民兵营长
张广礼 安阳县洪河屯公社南崔庄大队副支书

（暂缺干部一名、工人二名、学生一名）

信阳地区（共四名）

张士过 原信阳专署专员
张志成 罗山县定远公社春秋大队支书

（暂缺工人、学生各一名）

驻马店地区（共五名）

李瑞英 （女）原地委农村政治部副主任
张保群 驻马店木工厂工人
朱保德 原遂平县嵯峨山公社书记
冀桂昕 西平县师灵公社朱庄大队农民
宋慎言 西平高中学生

周口地区（共四名）

董万里 原周口地委第一书记
杜有中 淮阳县大张营大队支书

（暂缺工人、学生各一名）

南阳地区（四名暂缺）

平顶山特区（三名暂缺）

省军区参加省革委会委员名单（共十八名）

王 新	河南省军区政委	孙 焰	某部部队政委
张树芝	河南省军区司令员	杨宗毅	洛阳军分区司令员
陈桂昌	河南省军区副司令员	高书官	许昌军分区司令员
赵复兴	河南省军区副司令员	王 飞	太康县人武部副政委
王才贵	河南省军区副司令员	买仁虎	通许县人武部副科长
王 辉	河南省军区副司令员	姚景舜	商丘军分区政治部干事
杜河堤	河南省军区副政委	赵魁三	潢川县人武部干事
李忠顺	河南省军区副政委	刘 生	原 8202 部队军事教员
赵永安	某部部队政委	贾明堂	清丰县中队队长

驻军参加省革委会委员名单（共十一名）

杨力勇	某部部队政委	耿万恒	某部部队政治部主任
徐文礼	某部部队部队长	郭俊杰	某部部队政治部副主任
王洪智	某部部队部队长	周述平	某部部队副连长
靳 钟	某部部队部队长	皮光跃	某部部队排长
李 江	某部部队政委	王树清	某部部队排长
徐柏生	某部部队副政委		

【编读往来】

阎长贵来信，再答李自茂对王广宇《桀骜不驯的蒯大富》一文的指责。如下

王广宇在《桀骜不驯的蒯大富》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蒯大富这时翅膀已经

硬了，他的权势不仅在京城而且伸向全国，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在全国各地横行，各地发生的打砸抢抄抓事件几乎都有清华大学井冈山的影子。”李自茂撰文指责作者，认为上述说法，是作者的“臆断”。还“要求王先生必须就此话提出确凿的证据，并把那证据放到《记忆》内，否则就写出道歉文字来。绝不可继续文革大字报的笔法，信马由缰，‘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打击一大片’而保护中央文革‘一小撮’。”最后，李自茂还告诫王广宇“不要去‘望风捕影’。”

关于说王广宇“继续文革大字报的笔法”、“保护中央文革‘一小撮’”我已做过分析（见《记忆》总第20期），至于说王广宇“臆断”和“望风捕影”，我今天想借助清华文革的亲历者提供的材料说几句话。在邱心伟、原蜀育主编的《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2009年4月出版）一书，多次谈到了蒯大富的“井冈山兵团”在全国许多地方活动的情况。兹举几例：

页121，最近天津掀起一股攻击天大《八·一三》的反扑逆流。我兵团《驻天津联络站》支持天大《八·一三》，受到围攻恐吓，但兵团战士十分坚定。总部坚决支持天大《八·一三》。

页123，井冈山兵团驻沪联络站……。

页142，在“二月逆流”后，兵团向全国派出30多个《记者站》，共400多人，调查各地部队“支左”等情况，已插手外地运动。

页149，由《三司》、《一司》、清华《井冈山》、地质《东方红》……组成的《赴渝联络站》……。

页176，我兵团《驻成都调查团》……。

页236，（1967年）7月底8月初，团派外地《联络站》已有10多个，成员有数百人。

页 242 , 团派《沈阳联络站》同当地《八·三一》派一起并占领了沈阳军区司令部办公大楼已达 13 天之久。

页 248 , 蒯大富……电告清华井冈山《东北记者站》。

页 263 , 团和 414 两派联合后的《常州联络站》参与策划当地造反派组织《主力军》大武斗。这场武斗持续了 7 天, 两派群众 70 多人死亡, 百余人负伤。武斗中, 炸毁了奔牛铁桥, 致使京沪铁路停运达 12 天之久。

页 266 , 清华出去五千人, 去揪军内一小撮。

页 268 , 清华井冈山兵团《赴鞍纵队》……

这类材料说明什么, 无须笔者多言。

2009-6-21